

分类号_____

密级_____

U D C_____

编号_____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生计资本视角下农民养老

风险与策略研究

——以新疆农村地区为例

研究生姓名：余泽梁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于长永副教授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专业名称：社会保障

研究方向：农村养老保障

入学时间：二〇一五年九月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日

**Study on Old Peasants' Risk and Strategy in the
Perspective of Livelihood Capital
--Taking Rural Areas of Xinjiang as an Example**

Yu Zeliang

2018 年 5 月 20 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声明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的作品。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标明。

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余泽梁

2018年 6月 1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书

本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管理办法及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也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或汇编本学位论文。

注：保密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于本授权书。

论文作者（签名）：余泽梁

2018年 6月 1日

摘 要

21 世纪我国最显著的人口难题是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心在农村。一方面,与城镇相比,农村面临存量和增量双重老龄化压力;另一方面,农村面临着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幸福养老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养老保障体系之间的矛盾。由此,实现农村养老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以农户贫困问题与农民养老问题的共性与差异为依据,本文引入 DFID 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并进行调整与修正,构建了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利用 201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疆农村老龄人口贫困化研究”(12CRK006)对新疆农户的调查数据,首先对农民的养老风险和养老策略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全面概述了农民养老风险与养老策略的现状与特征;其次选取人力资本变量(儿子数量、女儿数量、文化程度、自评健康状况)、自然资本变量(拥有耕地数量、种植耕地数量)、物质资本变量(房屋面积、是否有交通类固定资产、是否有农业机器类固定资产)、金融资本变量(自评经济状况、家庭储蓄额)、社会资本变量(村经济发展状况、交通便利性、是否村干部、邻里关系状况)为自变量,分别运用 Ordinal Logistic 模型和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实证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及农民养老策略的影响。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农民养老风险程度低,生活照料、精神慰藉风险凸显;(2)农民养老策略多样化,“依靠自己”是农民养老的主要策略;(3)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存在显著影响。结合本文结论及前人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实现农民养老的可持续,一要,坚持以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养老战略;二要,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供给主体多元模式;三要,促进农户生计资本数量增加和结构优化。

关键词: 可持续生计; 生计资本; 养老风险; 养老策略

Abstract

In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most prominent population problem in China was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focus of the population aging problem was in the countryside. On the one hand, compared with the cities and towns, the rural area is facing the pressure of dual aging with stock and incre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rural area is fac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the aged and the lagging old age security system.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old-age. Based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farmers' poverty and farmers' pension problems, this paper introduces DFID's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nalysis framework and adjusts and corrections, and constructs a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alysis framework for farmers' pension risks and strategies.

Study on the poverty of Xinjiang rural aging population by 2012 annual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 "Youth" (12CRK006) of the survey data of farmers in Xinjiang, the first of the peasants' pension and pension risk strategies carried out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second selection of human capital variables (number, quantity, son daughter cultural level, self-rated health status), the natural capital (the number of variables with the amount of cultivated land, cultivated land), physical capital (variable housing area, if there is a traffic class of fixed assets, whether agricultural machine fixed assets), financial capital variables (self-rated economic status, household savings), social capital variables (development, traffic convenience, economy village whether the status of village cadres, neighborhood)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respectively, using the Ordinal Logistic model and Logistic model empirical classification The influence of livelihood capital on Farmers' pension risk and farmers' old-age strategy.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farmers pension is not high degree of risk, life care and spiritual comfort risk significantly; (2) farmers' pension strategy to diversify from "pension dependent" to "independent endowment"; (3) the existence of multiple impacts on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endowment risk and strateg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predecesso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o achieve sustainable farmers pension, to adhere to the reform, the rural old-age security system based on market demand; two, the sharing mechanism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family and the elderly pension

liability; three to promote the number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increase and structure optimization.

Key words: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Livelihood Capital; Pension Risk; Pension Strategy

目 录

导 论 1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1

 二、文献回顾与评价 2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7

 四、可能的创新与研究不足 8

第一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10

 第一节 概念界定 10

 一、生计资本 10

 二、养老风险 10

 三、养老策略 11

 第二节 理论基础 12

 一、风险社会理论 12

 二、可持续生计理论 14

 第三节 分析框架 16

 一、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适用性 16

 二、农民养老问题的可持续分析框架 17

第二章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研究假设 18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 18

 一、数据来源 18

 二、样本情况 19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描述 20

 一、养老风险与策略操作化 20

 二、生计资本度量指标 21

 第三节 研究假设 23

 一、生计资本与农民养老风险 23

二、生计资本与农民养老策略	24
第三章 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的影响	26
第一节 农民养老风险现状	26
一、养老风险程度	26
二、养老风险形式	26
第二节 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影响的回归分析	27
一、Ordinal Logistic 回归模型	27
二、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影响的估计结果及解释	28
第四章 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策略的影响	31
第一节 农民养老策略现状与特征	31
一、农民养老策略现状	31
二、农民养老策略多样性	33
第二节 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策略影响的回归分析	35
一、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	35
二、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策略影响的估计结果及解释	35
结论与建议	39
一、研究结论	39
二、政策建议	41
参考文献	43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48
致 谢	49

表目录

表 2-1 调查样本的地区分布情况.....	19
表 2-2 被调查对象个体特征的基本分布情况.....	19
表 2-3 农民养老风险操作化.....	20
表 2-4 农民养老策略操作化.....	21
表 2-5 生计资本变量选取及其描述统计.....	22
表 3-1 农民养老风险程度及其分布.....	26
表 3-2 农民养老风险程度与风险形式的交互分析.....	27
表 3-3 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策略的 Ordinal Logistic 回归.....	30
表 4-1 农民供养方式及其年龄和性别分布.....	31
表 4-2 不同年龄类别的农民对“养儿防老”策略的态度.....	32
表 4-3 供养方式与居住安排的交互分析.....	33
表 4-4 经济赡养策略的类型及其分布.....	34
表 4-5 生活照料策略的类型及其分布.....	34
表 4-6 精神赡养策略的类型及其分布.....	35
表 4-7 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策略的多项 Logistic 回归.....	38

图目录

图 0-1 研究技术路线图.....	7
图 1-1 DFID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15
图 1-2 农民养老问题的可持续性分析框架.....	17

导 论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一）选题背景

1999 年我国已迈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规模在此后十多年间不断膨胀。截至 2016 年底，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2.31 亿人，占总人口的 16.7%¹。我国老年人口数量仍在持续攀升，预计在 2050 年前将达到 4.82 亿，突破总人口比例的 35%（翟振武等，2017）。人口老龄化将是 21 世纪我国面临的最显著的人口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灾区。相较于城镇，农村面临存量和增量双重老龄化压力。在“存量”上，受市场经济发展和户籍制度放宽的影响，我国城乡老龄人口比例差异在 80 年代初现端倪，及至 90 年代中后期，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开始高于城市。结合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比结果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倒置”特征。在“增量”上，受生育率锐减、预期寿命延长以及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增长速度远超过城市。“五普”、“六普”数据显示，从 2000 年至 2010 年，我国城市和农村老年人口占比分别提高了 4.07% 和 2%，农村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是城市的 2 倍有余。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15）测算，我国城乡老龄化差异继续扩大的趋势将不可逆转，预计在 2033 年达到峰值，为 13.4%。

农村老龄社会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幸福养老需求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养老保障体系之间的主要矛盾（陆杰华、张莉，2018）。一方面，农村养老需求与老龄人口数量同步增加，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少子化以及贫困化（朱晓、范文婷，2017）“五化”并发²，农村养老压力剧增。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养老面临家庭养老或是社会养老独木难支的困境。微观上，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遭受社会转型、观念转变、人口流动多重冲击，严重弱化。宏观上，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公共服务建设存在制度不完善、保障水平低等问题，社会养老模式发展严重不足。在“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老龄化背景下，实现农村老年人养老福祉的可持续尤为重要。

¹ 民政部《2016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达到 23086 万人。

² 关于老龄社会“四化并发”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四化并发”包括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和少子化。与“四化”相比，农村老年人贫困化研究缺乏全国性的统计调查资料。但多个地方调研的结果均显示，我国农村老年人贫困化程度较高。农村老年人贫困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选题意义

第一，在理论层面上，从生计资本视角研究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问题丰富了可持续生计理论的内涵。生计资本和可持续生计理论运用多见于农村贫困研究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得到开发和重视。可持续生计方法作为一种集探究农户生计脆弱性根源与提供对应解决方案于一体的分析框架和建设性工具，在世界各地的扶贫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和实践。本文拟用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将生计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五个维度，分析农民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及策略的影响，探讨农民生计资本与养老问题之间的作用机理。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多，丰富了可持续生计理论，创新了农民养老问题的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第二，在实践层面上，对于优化农民养老保障策略、合理应对养老风险具有实践意义。在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的现实背景下，解决好农民养老问题是化解我国老龄化危机的重点。从农民自身角度看，农民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皆不相同，所以不同地区农民的养老风险及应对策略存在差异性。各类生计资本对农民的养老风险意识有不同的影响力，本文将基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以及发展规律，分析农民养老风险的结构特点以及养老策略的偏好性及其影响因素，综合分析各类生计资本的影响力，有利于农民规避养老风险，选择适合自己的养老风险处理策略。

第三，在政策层面上，从可持续生计角度完善农民养老保障体系具有政策意义。一方面，解决农民养老问题，是时代赋予政府的历史使命，一定的政策倾斜是很有必要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单靠政府力量是无法妥善帮助农民走出养老困境的，构建农民养老策略的“福利三角”框架，建立和完善社会、家庭和老年人个体养老责任的分担机制是必然的路径选择。在可持续分析框架下，探讨家庭养老、独立养老、社会养老的替代性与互补性规律以及农民生计资本与养老风险与策略之间的作用机理，可以为政府做出科学的养老决策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参考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评价

（一）关于养老风险的研究综述

回顾已有文献，学界对养老风险客观存在性的认可不谋而合，对养老风险概念的界定却莫衷一是。从宏观角度讲，养老风险是全社会养老资源供需不匹配的可能性，具体表现为养老金收不抵支、卫生保健供不应求、社会安定失衡等风险（Bodie Z., 2009）。从微观角度看，养老风险可分为经济风险和非经济风险两个维度（穆光宗等，

2014），具体表现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和精神赡养等方面的风险。从保障角度看，养老风险包括自我保障风险、家庭保障风险、制度保障风险和土地保障风险（薛庆天，2015）。从风险致因角度看，养老风险划分为“内生性养老风险”与“外生性养老风险”（穆光宗，2018）。从主观感知角度讲，养老风险既可以被定义为老年人养老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偏差（邓大松等，2008），也可以认为人们对老年际遇的理性预期及担心程度（钟涨宝等，2016）。还有学者从风险载体、风险层次等角度将养老风险划分成不同形式。关于养老风险的概念及内涵，还未形成规范研究。

关于养老风险测量的研究较少，主要包括客观测评和主观感知两个角度。从客观测评角度看，养老风险主要指养老金财务风险，具体包括养老金的入市风险、运营风险、投资风险、支付风险和制度风险等（沈澈、邓大松，2014；苏春红、李松，2016）。从主观感知角度看，又称养老为风险感知，主要通过程度大小来衡量。风险程度反映对养老风险的总体估计，包括二分类、三分类和五分类等多种划分方法。老年人养老风险大小具有结构差异。从群体对比来看，“四二一”结构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失独老人、空巢老人、流动老人、失地农民等特殊群体面临较大养老风险（宋健，2013；熊金武、黄义衡，2015；邵希言、赵仲杰，2016；黄锐、必勒格，2017）。从区域对比来看，总体上西部较中东部面临更大养老风险。从代际对比来看，农民养老风险程度代际差异显著，70年代出生的农民的养老风险程度最大，80年代相对最小（于长永，2015）。

关于养老风险形式的研究表明，农民面临多重养老风险。风险形式反映养老风险的具体表现形式，农民养老风险总体上包括经济风险和非经济风险两大类，具体表现形式有无经济来源、生活无人照料、健康无法保障、临终陪护缺失和精神慰藉缺失等（于长永，2015）。乐章、刘二鹏（2016）通过对 CLHLS 项目 2011 年数据的分析得出，农村老人陷入经济贫困、健康受损、精神孤独的比例依次是 24%、20% 和 30.2%。刘霓娜（2017）通过对 CHARLS 项目 2013 年数据的分析得出，农村需要照料的老年人无人照料的比例达到了 20.6%，照料状况不乐观。谷玉良（2018）通过对 121 位农村老人的深度访谈发现，农村人口外流使得农村养老面临情感关怀不足和生活照料缺失风险。

关于养老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证实，影响养老风险的因素较多。从制度角度看，计划生育政策主导下的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变化加剧了农民的客观养老风险（宋健，2018）。农民养老风险影响因素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区特征三个层次来考量，研究视角单一。从个体特征看，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养老观念、民族、婚姻状况、健康状况、职业类型、新农保参保情况等因素显著影响养老风险（张冲

等, 2013; 聂建亮、钟涨宝, 2014); 从家庭特征看, 经济状况、代际关系、子女数量是影响养老风险的重要因素(钟涨宝等, 2016); 从社区特征看, 经济发展情况、互助状况、地理区位等显著影响养老风险(徐俊, 2016)。

(二) 关于养老策略的研究综述

回顾已有文献, 关于养老安排的讨论多而杂, 仅从概念上来讲, 就有养老方式、养老模式、养老意愿、养老期望和养老策略等, 且已有文献并未对此做出明确的概念区分。从养老安排要素来讲, 讨论较多的包括居住方式、照料来源、经济来源、精神慰藉等多方面, 可概括为居住安排和供养方式(于长永, 2015)两个方面。

关于养老策略的概念, 还未达成共识。从宏观上看, 养老策略侧重农村养老制度的顶层设计, 主体是政府或社会(李俏等, 2016); 从微观上看, 养老策略等同于养老方式的选择, 主体是老年人(李亮、宋璐, 2016), 但两者也有区别。综合有关养老安排的文献可知, 关于养老策略内涵的划分不外乎三种, 一是依据居住方式的不同, 划分为包括独居和非独居及其变化(李春华、李建新, 2015); 二是按照供养方式的不同, 划分为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二分法”(姜向群, 2007), 以及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的“三分法”(穆光宗, 2000); 三是将两者糅合, 比如陶涛、丛聪(2014)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的三分类, 蒲新微、王宇超(2016)的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政府养老的三分类等。诸如互助养老、以房养老、医养结合和集中养老等新兴模式, 一般不划入到养老基本模式中来讨论。

就农民养老策略的特征而言, 从宏观层面看, 家庭养老功能在逐步弱化, “养儿未必防老”、“多子未必多福”等事实的出现(石智雷, 2015), 似乎正撼动着家庭养老模式在我国农村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全覆盖、河北肥乡互助养老模式的探索等, 无不预示着社会养老模式正在逐步发生变革。但从目前来看, 社会养老方式并不具备完全取代家庭养老模式的基础(张川川、陈斌开, 2014)。也有部分学者认为, 在某些欠发达地区, 农村自我养老的比重已超过家庭养老(陈芳、方长春, 2014)。可以说,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在此消彼长中向多元养老转变。从微观层面看, 已有研究大多以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为研究对象, 认为农民养老意愿“去家庭化”趋势明显, 逐步转向依靠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丁志宏, 2014), 但机构养老模式并未得到农村社会的认可。综上, 农民养老策略实则是一个整体, 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占比的变化是农民养老策略内部的结构优化。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的兴起, 是经济社会变迁和家庭结构变化的历史反映, 并非意味着家庭养老的消亡。研究农民养老策略问题, 要注重策略的多样性, 避免陷入策略优劣对比的困境。

就农民养老策略的影响因素而言, 于长永(2015)发现农民养老策略存在着明

显的地区差异和代际差异，与西部相比，东部农民依靠自我养老和保险养老的比例较大；从 50 年代到 80 年代，农民依靠自我养老和保险养老的比例呈增长趋势。吴春宝（2011）实证研究了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对农民养老策略的影响，发现年龄、健康状况、居住方式以及子女数量对农民养老策略有着重要影响。胡宏伟等（2011）研究收入与老年人养老策略的关系发现，低收入老年人偏向于家庭养老策略。唐利平、风笑天（2010）发现参加养老保险降低了农民养老对子女的依赖性。关于生育子女数与养老策略关系的研究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多生子女本身反应了农民对子女养老模式的选择（李建民，2004），孔祥智、涂圣伟（2007）发现养老策略与子女数量并无显著相关关系。

（三）关于生计资本的研究综述

关于生计资本评估问题的研究，主要争议集中在二级指标选取和指标权重确定上。就生计资本指标选取而言，一般地说，一级指标均包含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五大方面（DFID,2000）。关于二级指标的选取，各有差异，应遵循问题导向性、科学性、概括性、可操作性和区域性等原则（苏芳，2015）。就指标权重确定而言，方法包括客观赋权法和主观赋权法。其中，客观赋权法有离差法、因子分析法（李海燕、蔡银莺，2015）、主成分分析法等，缺点在于对调查数据的质量要求极高；主观赋权法常用的有层次分析法（AHP）（李小云，2007；杨云彦、赵锋，2009；宋璐、李树茁，2017）、专家咨询法（伍艳，2016），缺点是主观性太强。当然，评估指标和评估方法的差异影响着农户生计资本评估的结果。

关于生计资本及其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一方面，生计资本受社会政策和家庭等多重因素影响，包括扶贫政策（金梅、申云，2017）、退耕还林、计划生育政策（曹立斌，2015）、土地流转（翟黎明等，2017）、子女迁移（宋璐、李树茁，2017）等。另一方面，生计资本对农户活动存在显著影响，包括生计策略³（赵文娟等，2016；伍艳，2016）、生态保护（李海燕、蔡银莺，2015）、农地流转行为（纪红蕾、蔡银莺，2017）等。

关于从生计资本及可持续生计视角研究“三农”问题的文献很多，但大多集中在农户贫困领域，研究农民养老问题的极少。许汉石、乐章（2012）较早地在探讨农户的生计资本、生计风险与生计策略之间关系的时候，提及到农户的养老风险，但并未展开论述。张会萍等（2016）在生计视角下实证分析了土地流转背景下老年人是否选择继续劳作的问题，但仅仅是将生计资本概念应用到农民养老问题研究中。李树茁等（2017）首次构建了一个关于农村老年人生计、福祉与家庭支持政策

³ Scoones（1998）将农户生计策略的划分为单一依靠农业生产和多样化两类，后来的研究根据需要进行适当修改，有的分为纯农型、农兼型和兼农型三种，有的分为农业专业型为主和以非农单一化为主两种。

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可以说是对农民养老问题可持续分析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一个突破，遗憾的是缺少实证检验。

（四）简要评述

回顾已有文献，农民养老风险与保障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形成了较多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少有关于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的系统化的研究，致使研究面度不广，深度不够，规范化程度不高。

具体而言，关于农民养老风险的研究，一是，重视养老风险形式的探讨，忽视风险程度的具体测量。风险多样性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共性特征，而养老风险程度的大小反映了农民养老的根本处境，脱离养老风险程度谈风险形式，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二是，重视农民养老风险的理论分析，忽视养老风险的实证研究。理论具有普遍性特征，而农民养老问题的解决还需对症下药。脱离农民这个特殊群体谈养老风险，犹如闭门造车，缺乏对农民养老风险客观认识，对化解农民养老风险百害而无一利。要探讨农民养老风险问题及其对策，还需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做到共性与个性的相统一。

关于农民养老策略的研究，一是，概念界定不清晰，在现有研究中，常与“养老模式”、“养老方式”等混淆不清，除了命名不同，未对其差异作出区分。二是，重视对居住安排的研究，忽视对经济来源的分析。不论是居家养老，还是社区养老、机构养老，都只是反映了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差异，并未体现养老问题的本质——养老责任归属。三是，重视单一模式的研究，忽略策略的多样性。养老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农民个体、农户家庭、农村社区、政府与社会等都是这项工程的责任主体，家庭养老、自我养老、社会养老均是系统内子工程，缺一不可。

关于农户生计资本的研究，一是，受评估指标和评估方法影响，生计资本测量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有待考察；二是，关于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的研究比较缺乏；三是，从生计资本视角研究农民养老问题，缺乏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

对以上研究不足，本文基于特定情境，首先对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做出有约束效用的概念界定，将农民养老风险限定为农民的养老风险感知，包括养老风险程度和风险形式两个方面，将农民养老策略定义为包括供养方式与居住安排相结合的策略安排；然后对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进行适当调整，构建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的可持续分析框架，在框架范围内探讨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和策略的作用机理；接着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概述了农民养老风险程度与大小、农民养老供养方式与居住安排的现状和基本特点，运用非线性的定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农户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和策略的影响；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降低农民养老风险、加强农民养老保障，促进农民养老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对解决农民养老问题提供政策参考。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内容

本文共包含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介绍了本文选题的背景与意义、文献回顾与评价、文章的研究内容与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等。第二部分为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这一部分重点在介绍了养老风险、养老策略、生计资本等的概念和风险社会理论、可持续分析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养老问题的可持续分析框架。第三部分为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以及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为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的影响，首先从风险形式和风险程度两个方面描述了农民养老风险现状，其次运用 Ordinal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了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的影响。第五部分为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策略的影响。首先描述了农民养老策略的现状与特征，其次运用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了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策略的影响。第六部分是结论与建议，本章主要是对前三部分的背景介绍、可持续分析框架与农民养老风险及策略、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及策略的影响，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提出了针对性的农民养老保障政策建议。研究技术路线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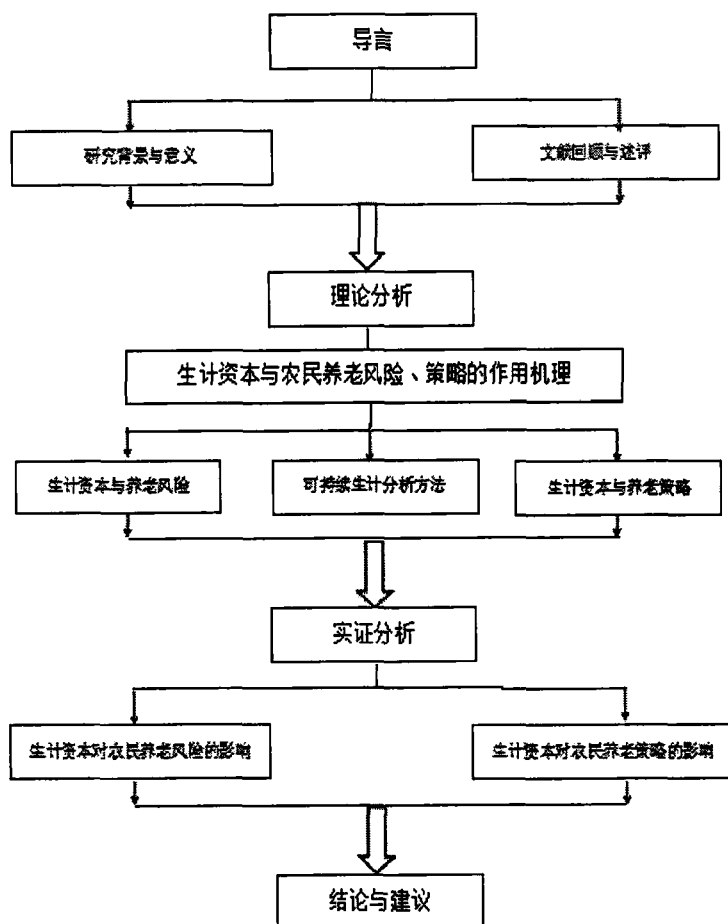


图 0-1 研究技术路线图

（二）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在全面搜集农民养老风险、农民养老策略和可持续生计等文献的基础上，回顾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提出本文的研究对象——中老年农民，研究内容——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问题，研究目的——通过风险和策略两个维度的分析探讨农民养老保障的制度选择，促进农民养老福祉的可持续发展；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借鉴生计资本的概念、内涵及逻辑，构建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的作用机理，厘清实证研究的关键变量。

统计分析方法与实证分析法。运用交互分析等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农户生计资本、农民养老风险、养老策略的现状与特征，运用 Ordinal Logistic 模型实证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的影响，运用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研究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策略的影响，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跨学科研究法。综合运用统计学、社会学以及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如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无序回归模型来对研究假设进行证伪，借鉴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对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与分类，运用社会保障学、老年人口学的背景来解释农民养老风险感知和养老策略选择的内在机理。

系统研究方法。本文将农民养老当作一个闭环系统，将农民养老脆弱性、生计资本、农民养老风险、农民养老策略、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革看作系统的各子部分。系统各要素之间“牵一发而动全身”，研究生计资本与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之间的关系，于解决农民养老问题而言，具有政策参考意义。

四、可能的创新与研究不足

（一）可能的创新

1.研究视角新颖。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大多用于农户贫困问题研究。本文基于该分析方法的可塑性以及贫困问题与农民养老问题的类似特点，将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进行适当修订，运用到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研究中来，研究视角新颖。既丰富了可持续生计分析理论，又促进了农村养老的可持续性研究。农民养老的可持续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围绕生计资本讨论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主张农民在抵御养老风险和选择养老策略过程中的自主性；二是，主张农民养老保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关注农民的养老需求。

2.研究方法创新。以往关于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问题研究多用定量研究方法，而运用生计资本理论研究农民养老问题还处于理论研究阶段，缺乏实证检验。本文综合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通过构建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的可持续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分析农户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的作用机理，运用 Ordinal

Logistic 回归和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别验证了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的影响，研究方法比较合理。

（二）研究不足

本文选取新疆范围的调查数据，生计资本指标的选取遵循区域性原则，因此所得结论适用于新疆地区，难以复制和推广到全国；鉴于生计资本指标选取的差异和权重确定的难度，本文放弃了对农户生计资本的指数化评估，无法直接比较生计资本各要素之间的大小；由于农村老年人养老通常兼具“依靠自己”、“依靠子女”和“依靠社保”多种策略，无法确定单一化养老策略和多样化养老策略的划分标准，所以缺乏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策略多样化影响的分析。

第一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第一节 概念界定

一、生计资本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 Chambers、Sen、Conway 等人在对农户贫困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生计 (Livelihoods) 概念的雏形。生, 即谋生, 是目的; 计, 即计策, 指方法。生计, 即为建立在能力 (Capabilities)、资产 (Assets) 和活动 (Activities) 的基础之上 (Chambers、Conway, 1992) 之上的维持生活的手段, 它反映了生计户的生存状态, 是建立在客观现实基础上的理性选择。其中, 能力包括身体素质和发展能力 (Sen, 1997), 由于其涵盖了资产和活动的部分内容, 导致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界限不明; 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 由于其具体形态多而复杂, 后被生计资本的分类方法所取代 (Scoones, 1998); 活动具有多样性, 包括生产活动、投资活动、保障活动等多种形态。与“工资”、“储蓄”、“接济”等概念相比, 生计的内涵和外延更广泛。一方面, 它关注生计活动与赖以存在的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 它跳脱出以收入或消费来衡量家庭生存状态的限定, 描绘得更加全面、生动、具体。

生计资本是农户降低生计风险、选择生计策略最重要的保证 (许汉石等, 2012)。其涵义非常广泛, 一般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五大类。也有学者将政治资本加入其中 (Baumann, 2000)。生计资本的多样性是实现生计策略多样化和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生计资本兼具可积累性和可消耗性, 应力求在生计实践中实现生计资本的结构转型和优化, 来维持生计资本的活力和再生能力。生计资本决定了农户生计能力的大小。回到农民养老问题, 本文将“生计资本”定义为降低养老风险, 决定养老策略的最重要的保证, 它决定了农民养老能力的大小。

二、养老风险

风险是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特征, 从某种程度上说, 全球社会也可以称作“全球风险社会”, 风险研究具有预警意义 (穆光宗, 2018)。一般认为, 风险是指未来事件发生及其损失的可能性。可持续生计分析理论认为, 贫困农户面临多重生计风险冲击, 极具脆弱性, 具体包括冲击、季节性和趋势三个维度。冲击包括自然灾害

和人为事故带来的伤害,比如旱涝灾害、重大疾病等;季节性是指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带来劳动力市场的周期性波动,不利于农民的稳定就业;趋势是指农业生产的变更给农民带来的不利变化,比如农业集约化生产带来农民土地的流失。

农民养老亦面临多重风险。从生命周期来看,老年是农民生命进程中的最后阶段,身体机能弱化、劳动能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致使老年农民自我保障能力减弱,这是农民养老所面临的“内生性风险”。从经济社会转型来看,农民养老面临人口转变、城乡福利分层等因素的冲击,致使老年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不足,这是农民养老所面临的“外生性风险”。在内外多重风险夹击下,农民养老极具脆弱性,可能导致农村老年人陷入无经济来源、生活无人照料、健康无法保障、临终陪护缺失的境地。

根据上文可知,现有研究关于养老风险的概念及内涵,还未形成规范研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本文将“养老风险”定义为养老保障缺失的可能性,包括生活照料风险、精神慰藉风险、经济保障风险、医疗保健风险和临终关怀风险等五大养老风险。

三、养老策略

策略,即为实现目标的手段集合。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生计策略是为实现生计目标所进行的策略选择或组合。生计策略具有多样性,Scoones(1998)按“三分法”将农户的生计策略划分为农业生产方式的选择(集约化或粗放化)、多种生计手段的组合以及人口迁移三种类型。其中粗放化是指扩大农户的种植面积,集约化是指加大农业生产的投资;多样化的生计策略能够有效规避生计风险;人口迁移是解决生计脆弱性的重要方式之一(Ellis, 2003)。养老策略是农民为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所进行的策略选择与组合。养老策略也具有多样性。农民养老策略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供养方式选择,二是居住安排策略。

综上,养老策略与养老方式、养老模式、养老意愿、养老期望存在共性与差异。共性在于,它们的内容无本质区别,都包括家庭养老、自我养老、社会养老、居家养老以及机构养老等方面。差异在于,各自侧重点不同。养老方式、养老模式与养老意愿、养老期望存在客观与主观的差异;养老模式是养老方式的类型化,即养老方式强调个性化差异,而养老模式着重宏观层面的趋同性和均质性(卢德平, 2014);养老策略则凸出集合性,即多种养老手段的结合。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养老策略”定义为,实现养老保障的手段及组合。

第二节 理论基础

一、风险社会理论

（一）风险社会内涵

风险社会理论是研究现代社会风险的主流视角。作为风险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风险社会”最早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提出，他认为现代化进程加剧了社会风险，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全球社会正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灾难和危害，风险社会更加关注制度性风险，认为风险社会的根源是现代社会制度本身。风险社会具有以下典型特征：一是全球性，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使得风险的危害逐渐跨越区域的限制，全球性风险急剧增加；二是人为性，现代社会风险大多源自于人类行为与决策，且其危害受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而加剧，如核危险、地震危害等；三是复杂性，现代社会不仅面临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风险，而且这些风险往往相互交织，使得社会风险变得复杂多样；四是脆弱性，在自然灾害、社会极端事件等面前，人类的脆弱有目共睹（范如国，2017）。

（二）风险社会治理

1. 倡导自反性现代化

风险社会是与社会现代化相伴而生的，一方面，社会现代化造就了现代社会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社会现代化加剧了社会风险。但是，解决社会风险绝不是要对现代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革命，而是通过反思现代社会制度并进行适当的变革来抑制社会风险的发生（Ulrich Beck, 1999）。

2. 健全风险管理机制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人类社会不安全因素增加，即使是专家也无法准确预知风险。因此，应逐步削弱个人决策在风险应对过程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建立和完善社会风险管理机制。一要增强风险的警惕性，认识到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客观性和危害性，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二要采取多元化社会风险应对策略，分散风险往往是应对风险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三要明确风险责任主体，合理区分受益者、受害者和责任人，减少社会风险发生的人为因素；四是倡导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实现信息的共享与协同，增强应对风险的能力。

3. 完善社会福利制度

“福利国家”兴起的本意是为了防范社会风险，且在初期起到了显著作用，有效降低了社会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旧式福利制度遭遇严重危机，甚至演变为风险发生的动因（吉登斯，2000）。究其原因，是旧式福利制度与现代社会存在脱节现象，或是提供的不该提供的服务，或是服务与需求的错位。因此要

积极进行社会福利制度变革，由福利国家向福利社会转变。

（三）风险社会与农村养老

中国现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人口老龄化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腐败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多种社会问题在这一发展阶段集中爆发。可以说，中国正迈入高风险社会（范如国，2017）。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重和社会养老保障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农民养老面临包括生活照料风险、精神慰藉风险、经济保障风险、医疗保健风险等在内的多重风险的侵扰。

1. 经济保障风险

一直以来老年人经济保障问题就备受关注。一是农村老年人自养能力不足。一般来说，退休是老年人的特定生活状态，退休行为直接导致了老年人收入的减少；而受就业渠道等因素影响，农村老年人再就业形式严峻。二是土地养老保障能力削弱。一方面，小规模农业种植创收能力有限，一旦遭受自然灾害，则很有可能颗粒无收、损失惨重；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流转发展不足，存在农民土地流转意愿不强以及市场化程度低的问题。三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不足，主要体现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和保障水平低两个方面。四是家庭养老压力大。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四二一”家庭数量明显增加，年轻子女的抚养压力大。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及其经济保障风险不容忽视。

2. 生活照料风险

老年期是多种疾病的高发期和并发期，这一阶段的老年人身体机能快速弱化、生活自理能力显著下降。2016年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数量高达4063万，约占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庞大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数量意味着对生活照料的巨大需求。农村老年人生活照料存在着供给不足以及供需不匹配等问题。从照料模式来看，虽然农村老年人生活照料包括亲情模式、友情模式、市场模式、自愿模式和福利模式等多种模式，但是依然无法满足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需求。具体地说，少子化以及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弱化了家庭的照料功能，熟人社会的友情照顾以及自愿者服务活动仅仅起到辅助性作用，老年护工的短缺显示出市场模式有待进一步发育，而农村社会福利模式的发展明显不足。

3. 精神慰藉风险

精神慰藉，也称作精神赡养，是农民养老的主要内容之一。精神慰藉包括“他养”和“自养”两个方面。“他养”包含家庭精神养老支持和社会精神养老支持。一方面，我国农村空巢老人数量庞大，超过农村老年人口总量的50%，子女陪伴的缺失加剧了农村老年人的孤独感；另一方面，精神养老的社会供给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政府对农村老年人的精神关怀缺失以及农村社区老年人志愿服务缺乏等。与

“他养”相比，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自养”问题受到较少关注。农村老年人存在感缺失、文化程度低以及身体机能弱化是导致农村老年人精神养老不足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临终陪护缺失也是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风险的重要表现。

4. 医疗保健风险

步入老年期的农民，身体抵抗能力下降，疾病多发，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糖以及心脏病等。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明显较城镇老年人差，不健康比例高达20.3%⁴。与此同时，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医疗保障严重不足，一方面，农村医疗资源配置水平低，农村社区医院数量少、人才匮乏及设备落后导致农村医疗供给明显不足；另一方面，新农合以保大病为主要目标，对多数常见病却“视而不见”。

二、可持续生计理论

（一）可持续生计概念

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 SL）是生计概念的延伸，最早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提出，多用于对贫困问题的研究。随着内涵的不断丰富及其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可持续生计研究关注度逐渐提升。极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可持续性农村生计：一个分析框架》（Scoones, 1998）和《可持续生计实践：农村的早期应用》（Farrington, 1999）。所谓可持续生计，是指当人们进行活动选择时，能够促进自我发展与宏观政策、生态环境、后代子孙、他人利益的协调与平衡，体现了系统论的思想。Chambers 和 Conway 认为，可持续生计是处理好自己与他人、当代与下代的关系，即生计策略既能应对压力和挑战，加强能力与资产，还为下代留下可持续发展机会，并促进他人效益的提升，将生计目标与生计结果实现有机结合。

（二）可持续生计方法

1. 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概述

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生计研究受到广泛关注，也衍生出多个分析框架，包括英国国际发展计划部（DFID）、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以及国际救助贫困组织（CARE）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三者的共同点是都致力于生计系统与政策制度的有机统一，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其中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以脆弱性群体为研究对象，以生计资本和过程转变为分析基础；UNDP的可持续生计分析强调政策、技术和投资的驱动作用；CARE的可持续生计分析强调人的基本需求与权力。对于农户生产生活状况的研究，尤以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

⁴ 数据来源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自评健康数据。

架应用最多，影响最大。

2.DFID 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DFID 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7 年英国国际发展部发布的国际发展白皮书中。后经过不断修改完善，形成了如图 1-1 的主要框架。生计资本、可行能力（阿玛蒂亚·森，2006）和生计策略是可持续生计分析的核心概念，由此发展出了对农户生产生活状态评估研究的多种分析体系。在该框架中，可持续生计是在脆弱性背景下，通过生计资本、生计策略、政策制度的交互作用来实现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从能力、资产和行动策略三个维度、而不是直接从生计需求入手，深入研究了生计问题，为消除羁绊农户生计稳定发展的不利因素、构建农户发展的基础、培育农户生计发展的能力和实现农户生计目标提供了重要参考（赵峰，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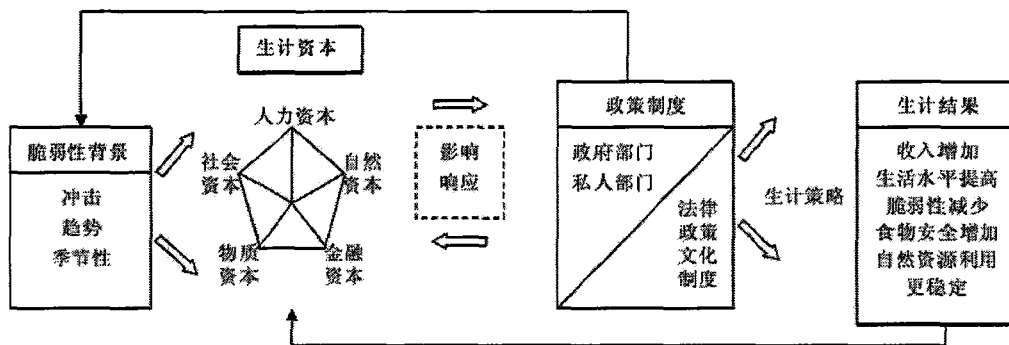


图 1-1 DFID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3.可持续生计分析的基本原则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设定了以人为中心、生计动态性、宏微观相结合和可持续性等原则，旨在消除贫困以及促进农户的可持续发展。分析框架以人为中心、把人放在发展的首要位置，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挥贫困人口在脱贫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贫困人口不只是弱势群体，也具有某个（些）方面的优势，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贫困人口自主脱贫的能力；二是政策、制度的制定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关注对贫困人口能力的提升，主张造血式扶贫，摒弃输血式扶贫方式。生计动态性，可持续生计系统各要素都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贫困人口所处的脆弱性背景、政策制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牵引着贫困人口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变动，共同构成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的循环系统。宏微观相结合，将贫困人口面临的宏观环境与微观差异联系起来，重视贫富不均的客观存在性，有的放矢实现精准扶贫。可持续性，包含生计可持续、经济可持续、体制可持续、社会可持续和环境可持续，生计可持续与其他可持续相辅相成。

（三）可持续生计应用

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源自国外，研究时间长、应用范围广，但主要集中于农村社会发展领域。美国经济学家诺曼·厄普霍夫（2006）主张“爱援性自立”，强调依靠农户自身来改善生计状况，蕴含着可持续生计思维。哈特利·迪安（2009）提出政策制定要考虑当代人与下一代的生计平衡。Carmen 和 Frederick（2009）提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对生计可持续的促进意义。Cherni 等（2009）对古巴农村社区的研究发现，发展小规模再生能源技术可提高农户生计可持续性。Vista 等（2012）对菲律宾某椰果庄园为的研究发现，土地改革政策对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没有显著影响。

国内对可持续生计方法的应用起步较晚，且并未形成独立的分析体系，以借鉴已有分析框架为主。研究内容大概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介绍。唐丽霞等（2010）将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与社会排斥理论以及脆弱性理论进行了对比分析；王三秀（2010）对国外可持续生计理论和发展作了系统性的阐述。二是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的基础应用，即生计资本的测量与对比（杨云彦等，2009；陈艾，2015）。三是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的拓展应用，即生计资本、政策制度、生计策略及生计后果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李树苗等（2010）研究了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冀慧珍（2012）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提出了社会救助政策改革的若干措施。四是以特殊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可持续生计应用，包括失地农民（苏永伟等，2015；丁士军等，2016）、库区移民（李丹等，2015）等的可持续生计研究。

第三节 分析框架

一、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适用性

本文引入的是 DFID 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首先，该框架只提供简单的研究思路，具有较强的灵活性，研究者可根据对象需要进行适当修正与调整，为将可持续分析方法拓展到农民养老领域提供了前提基础。其次，农民养老问题与贫困农户的生计问题存在诸多共性，将可持续生计方法应用到农民养老问题研究具有较高的融合度。一是，与贫困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类比，农民养老亦极具脆弱性，二是，生计资本表征农民的养老能力，养老策略是农民生计策略的重要部分。三是，与生计多样化类比，养老策略强调多样性，是多种养老方式的有机结合，具有分散风险的特性。最后，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坚持以人为中心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对解决农民养老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二、农民养老问题的可持续分析框架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可借鉴可持续性生计分析框架来解释农民的养老风险与策略问题，修订后的分析框架如图 1-2，主要包括养老脆弱性、生计资本、养老风险、养老策略以及养老体制变革几个部分。

首先，从保障角度看，农村面临多重困境，一方面，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遭受社会转型、观念转变、人口流动多重冲击，严重弱化。另一方面，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公共服务建设存在制度不完善、保障水平低的问题，社会养老发展严重不足。由此农村保障具有脆弱性特征。

其次，在脆弱性背景下，生计资本是农户及农民养老赖以生存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五个方面。生计资本的数量大小、结构优化与否决定了农民养老能力的大小，主要体现在降低农民养老风险和决定农民养老策略两个方面。农民养老风险包括风险大小和风险形式两个方面，农民养老策略包括供养方式和居住安排两种类型。农民养老风险可能阻碍其可持续养老福祉的实现，农民养老策略会优化农民养老福祉的可持续性。农民养老风险与养老策略共同决定了农民的养老福祉后果。

最后，基于农民个体养老福祉结果的集合即为农村养老的总体状况。政府及社会也应结合政策目标及养老状况进行养老保障体制变革，改变农民养老保障脆弱性的现状，实现“老有所养”。农村养老体制变革大体上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完善社会养老机制，推进社会化养老进程；二是，创新家庭支持政策，强化家庭养老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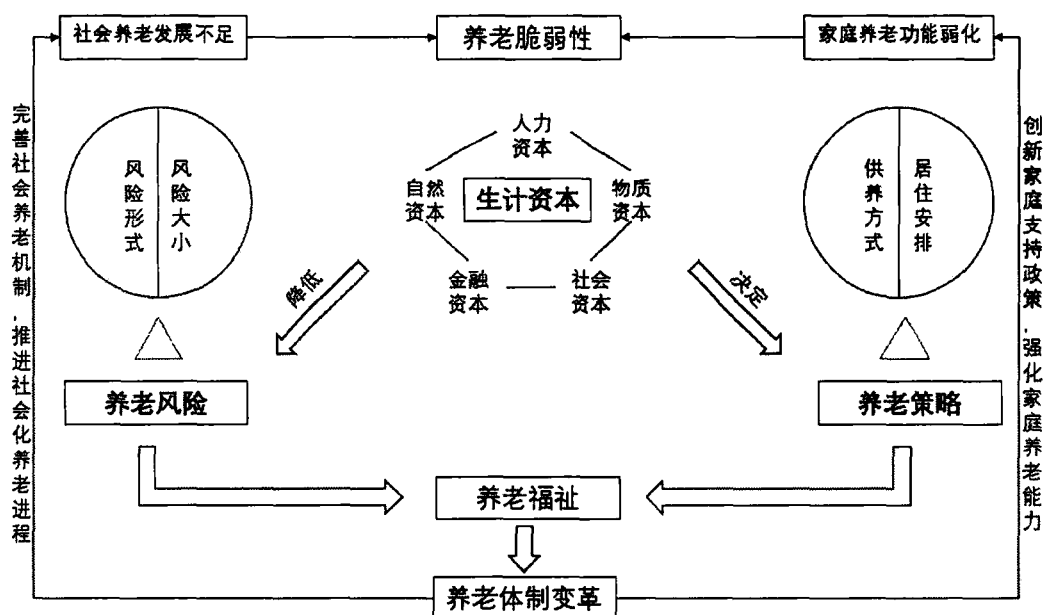


图 1-2 农民养老问题的可持续性分析框架

第二章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研究假设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

一、数据来源

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新疆地区计划生育政策较为宽松,人均寿命相对较低,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较晚,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据统计,2010 年新疆地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 10.8%,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截止 2015 年底,新疆地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 11.2%,较全国平均水平低 4.9%⁵。但从发展速度来看,2010 年至 2014 年间,新疆地区老年人口年均增长 15.32 万,年均增长率高达 8.67%⁶,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果考虑人口流动因素,包括新疆在内的西部农村地区未来的养老压力将进一步加剧⁷。与此同时,从经济发展水平看,新疆地区 2016 年全年人均 GDP 为 6086 美元,与发达国家历史相比⁸,“未富先老”特征明显;从养老资源配置角度看,新疆地区养老事业水平滞后,无法适应人口老龄化快速增长的要求,处于“未备先老”的境地。从“四普”到“六普”,新疆地区老年人口的增长比率约为养老资源增长率的 3 倍⁹(戴建兵,2017);从养老模式变迁角度看,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受人口老龄化与土地流转影响,已无法满足农民的保障需求,而机构养老、以房养老等新模式的发展也是困难重重。

本文数据来自对新疆农民养老问题的调查,调查问卷经过了专家讨论和试调研。课题组 2012 年在新疆选定 13 个地州市 56 各县作为样本区域,在各个县随机选取 1-2 个村的农户进行入户调查与访谈(如表 2-1)。共发放问卷 1000 份,回收问卷 939 份。基于农村中老年群体的主体需要以及对数据质量的要求,剔除了部分样本;为达到数据完整性要求,采用期望最大化方法(EM)对部分系统缺失值进行填充;根据年龄要求对部分样本进行了剔除,最终得到了 854 个微观样本的资料。

⁵ 新疆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达258.7万, 占总人口逾一成, 地址: <http://news.sina.com.cn/o/2016-12-24/doc-ifxyxvcr7460075.shtml>。

⁶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新疆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⁷ 国家卫计委《中国流动人口报告 2017》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在 2015 年出现拐点,之前大规模的增长开始下降。有专家预测,未来一大批中老年农村流动人口将因未能融入大城市而返回原流出地,将加剧西部农村地区的养老压力和全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复杂性。

⁸ 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人均 GDP 平均达到 1-2 万美元。

⁹ 从“四普”到“六普”,新疆地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长率为 21.24%;养老资源包括每百位老人拥有的机构养老床位数、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数量、医生数量以及服务人员数量,运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的养老资源增长率为 7.09%。

表 2-1 调查样本的地区分布情况

市、地区、自治州		区县（市）个数	样本村个数	样本个数
七个地区	乌鲁木齐市	2	2	21
	哈密地区	2	2	34
	塔城地区	4	5	51
	阿勒泰地区	2	2	30
	阿克苏地区	6	8	106
	喀什地区	11	12	166
	和田地区	5	6	98
	吐鲁番地区	2	3	34
五个自治州	昌吉回族自治州	4	4	51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8	12	152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2	2	26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5	5	51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3	4	34
合计		56	67	854

二、样本情况

被调查对象中，从性别差异看，男性农民人数占比 56.7%，女性为 43.2%，性别分布较为均衡；从民族分布看，民族类型较多，且维吾尔族和汉族占据绝大多数，比例高达 83.6%，与新疆地区以汉族和维吾尔族为主、多民族聚居的特征相符；从婚姻状况看，已婚农民占比 77.1%，非在婚状态农民占比 22.9%；从健康状况看，健康状况一般的比例最大，为 46.8%，其次是健康状况良好，比例为 30.5%，健康状况差（包括较差和残疾）的人数占比为 22.6%；从年龄分布看，中年农民、低龄老人、中高龄老人占比分别为 19.4%、54.5%和 26.1%；从文化程度看，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小学及以下占比 75.6%，初中及以上学历者仅占 23.9%。以上基本符合新疆农村地区的状况，说明问卷数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表 2-2 被调查对象个体特征的基本分布情况（%）

项目	类别	频率	项目	类别	频率
性别	男	56.8	婚姻状况	已婚	77.1
	女	43.2		非在婚	22.9
民族	汉族	40.5	自评健康	良好	30.5
	维吾尔族	43.1		一般	46.8
	回族	7.7		较差	21.2
	其他	8.7		残疾	1.4

项目	类别	频率	项目	类别	频率
年龄	45-59	19.4	文化程度	没上过学	32.5
	60-69	54.5		小学	43.1
	70 岁及以上	26.1		初中	17.5
				其他	6.4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描述

一、养老风险与策略操作化

（一）养老风险操作化

本文通过风险感知的方式来测量农民养老风险，反应了农民对老年生活安全的理性预期和担心程度，具体操作化为养老风险程度和养老风险形式两个指标（见表 2-3）。其中养老风险程度采用五分法。在问卷设计中，主要通过该问题来反映：“您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吗”。答案为：1=非常担心；2=比较担心；3=无所谓；4=不很担心；5=一点也不担心。担心程度大小表示农民养老风险程度的大小，共分为五个程度。从 1 至 5，风险程度渐小。养老风险形式包括六个维度。在问卷设计中，主要通过该问题来反映：“您最担心的养老问题是什么”。答案为：1=缺乏经济来源；2=生活无人照料；3=精神孤独空虚；4=生病得不到治疗；5=无人送老上山；6=其他。

表 2-3 农民养老风险操作化

农民养老风险	问题	变量说明
养老风险程度	您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吗	1=非常担心；2=比较担心；3=无所谓；4=不很担心；5=一点也不担心
养老风险形式	您最担心的养老问题是什么	1=缺乏经济来源；2=生活无人照料；3=精神孤独空虚；4=生病得不到治疗；5=无人送老上山；6=其他

（二）养老策略操作化

本文将农民养老策略具体操作化为供养方式和居住安排两个指标（见表 2-4）。就供养方式而言，在问卷设计中，主要通过该问题来反映：“为保障老年人生活，您自己最重要的办法是”。答案为：1=保持劳动能力种地；2=多存点钱或财产；3=多在子女教育上投资；4=购买商业养老保险；5=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6=老了再说。从养老资源来源出发，对策略进行组合归集。其中将保持劳动能力种地、多存点钱或财产和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归集为依靠自己，即自我养老；将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归纳为依靠社保，属于社会养老的重要形式；多在子女教育上投资即为依靠子女，为家庭养老的主要方面，将老了再说列为单个选项，即为随机养老。如此则

将农民的养老策略分为四个方面：依靠子女、依靠自己、依靠社保和老了再说，符合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的分类依据。就居住安排而言，在问卷设计中，主要通过该问题来反映：“您和谁住在一起”。答案为：1=一个人独住；2=老两口住在一起；3=和子女一起住；4=其他。

表 2-4 农民养老策略操作化

农民养老策略	问题	变量说明
供养方式	为保障老年人生活， 您自己最重要的办法是	1=保持劳动能力种地；2=多存点钱或财产；3=多在子女教育上投资；4=购买商业养老保险；5=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6=老了再说
居住安排	您和谁住在一起	1=一个人独住；2=老两口住在一起； 3=和子女一起住；4=其他

二、生计资本度量指标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及农民养老问题实际，本文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五个维度来度量农户的生计资本，具体二级指标的选取遵循相关原则，自变量选取及描述如下（见表 2-5）：

人力资本是农民为实现养老目标所能获得的人力资源，来自于农民自身和农民家庭两个方向。从农民自身来说，选取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两个指标。从农民家庭来说，儿女是家庭养老最重要的来源，儿女数量的多少对农民养老有重要影响，为考察子女性别在农民养老风险、策略中的影响差异，本文将儿女数量分儿子数量和女儿数量两个指标来考核。在人力资本变量中，儿子数量的均值为 1.84，女儿数量的均值为 1.75，也即农户家庭平均子女数为 3.59 个，这与计划生育前农村“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吻合；也即在新疆地区，对现阶段已经进入老年阶段的农民来说，不存在少子化带来的养老压力大的问题。文化程度的均值为 2.09，为小学学历，说明新疆地区中老年群体的整体文化水平不高。自评健康状况的均值为 3.063，处于一般及以上水平，说明新疆地区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较为良好。

农民生来与土地密不可分，土地养老一度被认为是与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并列的一种养老策略。如此，在农民的自然资本中，选取拥有耕地数量和种植耕地数量两个指标。在自然资本变量中，拥有耕地数量的均值为 17.124，说明新疆地区农户平均拥有耕地较多，这与新疆地区地广人稀的区域特征吻合。种植耕地数量的均值为 12.812，仅为耕地面积的 74.8%，且其标准差大于耕地面积的标准差，说明农户种植耕地数量的差异较大。

物质资本在农民生活中起到了保障其“住”、“行”和“农业生产”的作用，

房屋面积、交通类固定资产（如汽车、摩托车等）、农业机器类固定资产（如拖拉机、收割机等）反映农民物质资本的大小。在物质资本变量中，房屋面积的均值为 140.937，是否拥有交通类固定资产和农业机器类固定资产的均值分别为 0.894 和 0.605，说明在新疆地区，超过一半的农户拥有交通类固定资产或农业机器类固定资产。

金融资本主要保障农民的经济安全，主要从自评经济状况和家庭储蓄额两个方面来衡量。在金融资本变量中，自评经济状况的均值为 3.025，处于大致够用与够用有余之间，说明新疆地区农户对家庭经济状况比较乐观。家庭储蓄额的均值为 1.98，平均家庭储蓄处于 1 万与 3 万之间。

社会资本与农民养老息息相关，村经济发展程度、交通便利性、是否村干部以及邻里关系状况影响农民可获得社区养老资源的多寡。在社会资本变量中，村经济发展状况的均值为 3.100，总体介于一般与富裕之间。交通便利性的均值为 3.605，总体上处于一般至比较方便的水平。是否村干部的均值为 0.069。邻里关系状况的均值为 1.63，邻里关系良好。

表 2-5 生计资本变量选取及其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人力资本变量			
儿子数量	农民的儿子数量	1.840	1.096
女儿数量	农民的女儿数量	1.750	1.248
文化程度	没上过学=1；小学=2；初中=3；高中、中专、中技=4；大专及以上=5	2.090	0.918
自评健康状况	残疾=1；较差=2；一般=3；良好=4	3.063	0.757
自然资本变量			
拥有耕地数量	自己有多少耕地	17.124	13.828
种植耕地数量	现在耕种多少耕地	12.812	14.942
物质资本变量			
房屋面积	家庭住房面积	140.937	56.709
是否有交通类固定资产	无=0；有=1	0.894	0.308
是否有农业机器类固定资产	无=0；有=1	0.605	0.489
金融资本变量			
自评经济状况	十分困难=1；有些困难=2；大致够用=3；够用有余=4	3.025	0.637
家庭储蓄额	1 万以下=1；1-3 万=2；3-6 万=3；6-10 万=4；10 万及以上=5	1.98	0.942
社会资本变量			
村经济发展状况	非常贫穷=1；比较贫穷=2；一般=3；比较富裕=4；很富裕=5	3.100	0.626

变量名称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交通便利性	很不方便=1；不太方便=2；一般=3；比较方便=4；非常方便=5	3.605	0.788
是否村干部	否=0；是=1	0.069	0.254
邻里关系状况	非常好=1；比较好=2；一般=3；不太好=4；很不好=5	1.63	0.735

第三节 研究假设

一、生计资本与农民养老风险

养老风险是养老安全与养老困境的中间状态，正确认识并化解养老风险可使农民免于陷入养老困境，实现养老安全。对个体农民养老风险测量，可称之为养老风险感知，主要采取风险感知的方法，即农民养老风险是农民基于自身养老资源对养老风险的合理预期与担心程度。此处养老资源主要指农户的生计资本，生计资本数量越小，养老能力越差，对养老风险的预期越悲观、担心程度越高，养老风险程度就越高。

在人力资本要素中，子女数量以及文化程度、自评健康状况分别从家庭层面和个体层面来反映人力资本力量的大小。家庭养老是我国农民最传统和最主要的养老方式之一。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化，具体表现为少子化和代际分离。劳动力的减少，意味着家庭整体收入水平的降低，加剧了农村老年人经济资源匮乏的可能性；代际分离，意味着农村留守老人和空巢老人数量增加，造成了农村老年人无人照料以及无人送终的窘境。自我养老是解决我国农村养老难题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文化程度对农民养老风险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效应（于长永，2011），文化水平越高的农民其自我增收能力越强，面临经济性困难的可能性越低；自评健康状况越好，农民遭受疾病困扰的可能性越低，对医疗保健服务以及日常生活照料服务的需求越低，养老风险程度相对较低。

在自然资本要素中，土地集中反映了农民自然资本力量的大小。土地在解决农民养老问题中一直发挥着重要角色。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作为农民最主要的生活来源是农民的“命根”所在。随着城镇化、市场化以及工业化的发展，土地对于农民的保障功能似乎在弱化，土地种植不再是农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土地对农民不重要了吗？答案显而易见。在“圈地浪潮”袭来之时，农民“寸土不让”的新闻屡见报端。一方面，市场化与工业化使得土地价值疯狂增长，土地保障的能力随之提升；另一方面，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城市的生活稳定性相对较差，土地作为最后一道保障，所带来的兜底效用不可忽视。综上，土地与农民养老密不可分，土地流失，

将增加农民养老风险。

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同样反映了农民经济保障能力的大小。在物质资本要素中,不同类型的固定资产共同构成农民物质资本力量的大小。房屋是农民生活的基本保障之一,解决了农民养老生活中“住”的问题。一般而言,房屋面积越大,表征农民“住”的质量越高,也反映了农户经济收入水平较高,陷入经济困境的可能性越低。小轿车、摩托车等具有储蓄功能的固定资产,也反映了农户的经济能力。而生产类型的固定资产,一般不具有变现功能,且价值不高,对农民养老能力的提升有限。在金融资本要素中,自评经济状况和家庭储蓄额分别从主观和客观角度反映了金融资本力量的大小。自评经济状况越好、家庭储蓄额越高,金融资本力量越强,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越强。

在社会资本要素中,主要从村域发展、邻里关系、社会地位三个角度反映社会资本力量的大小。村域发展状况越好,社会保障网更安全,农民面临养老风险的可能性就越低。良好的邻里关系,一方面促进了互助养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降低了老年人的孤独感,因此,邻里关系越好的农民陷入养老风险的可能性越低。社会地位主要通过社区身份来体现,社会地位越高的农民获得资源的途径越多,对摆脱养老风险具有正向作用。

二、生计资本与农民养老策略

农民养老策略是以降低农民养老风险、实现农民“老有所养”为目标,在合理预期养老保障条件的基础上,对养老方式的理性选择。此处的“养老保障条件”主要指农户的生计资本,是养老策略选择的客观基础,而目标、预期、选择无不体现了农民养老的主观能动性。农民养老策略的本质区别是供养方式的差异,据此可区分为依靠子女、依靠自己和依靠社保三种策略组合,分别对应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三种策略没有优劣、大小之分,且可以实现多样化选择。养老策略的无序性,决定了其与生计资本不是简单的正(负)相关关系。生计资本包含自我、家庭、社会养老资源要素,决定了农民各方面养老能力的大小。故生计资本的数量、结构均对农民养老策略有多重影响。

人力资本影响农民养老策略选择的认知和偏好。子女数量的多少,影响农民对家庭养老能力的预期。一般的说,子女数量越少,其分担的养老压力越大,家庭养老功能越弱,农民对家庭养老的预期会比较悲观,选择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策略的可能性越大。文化程度越高,一方面,受传统家庭养老观念的束缚越小,更能接受多元化的养老方式;另一方面,对养老风险的预判更准确,收入和储蓄的能力越强,农民倾向于选择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的可能性越大。健康状况越差、饱受疾病困扰,

工作能力和工作收入越小，甚至无法实现对自我生活的照顾，对家庭和社会的依赖性就会越高，选择自我养老的可能性越小，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策略。

自然资本影响农民养老策略选择的自由度。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保障，其他养老保障来源少、层次低，依靠土地（土地种植收入）与依靠子女相结合是农民最重要的养老策略。伴随着土地资源的社会化与市场化，农村土地无人耕种与征地户一夜暴富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了在经济效益方面，土地的基础收入（依靠种植）逐渐弱化，附加收入（依靠出租、流转等）逐渐强化。对于以土地种植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来说，其养老手段比较单一，依靠土地依然是最重要的策略选择；对于土地流转和出租农户来讲，不用固守土地，其养老策略选择的自由度更大，即土地对农民养老策略选择的影响弱化。

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是农民实现养老意愿的必要条件。养老策略是农民基于自身主、客观条件的理性选择，其中客观条件即为农户生计资本状况，主观条件即为农民的养老需求与养老观念。当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之后，农民可根据自身养老需求选择不同养老策略；当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无法满足老年人生活需求，自我养老和家庭养老均无法实现“老有所养”目标之时，社会养老将是农民养老的最后一道保障。

社会资本削弱了农民对家庭的依赖程度。在村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交通便利性越好、社区发展程度越高、社会保障整体水平相对较高及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越完善的情况下，农民选择社会养老的倾向更高。邻里关系越好，获得互助养老支持的可能性越大，可能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和临时性的生活照料需求，削弱了农民对家庭的依赖性。与一般农民相比，村干部的自我保障水平相对较高，获取社会养老资源的渠道更广，一般更倾向于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策略。因此，社会资本越活络，农民对家庭养老的依赖程度越低，选择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的可能性越大。

综上，本文作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一：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存在正面影响，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生计资本数量越大，农民养老风险越小；

假设二：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策略具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本影响农民养老策略选择的认知和偏好，自然资本影响农民养老策略选择的自由度，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是农民实现养老意愿的必要条件，社会资本削弱了农民对家庭的依赖程度。

第三章 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的影响

第一节 农民养老风险现状

一、养老风险程度

根据农民养老风险程度的描述统计（见表 3-1），农民选择一点也不担心、不很担心、无所谓、比较担心和非常担心的比例依次为 23.8%、39.0%、10.5%、21.0% 和 5.8%。在新疆地区，农民选择不很担心的比例最高，其次是一点也不担心、比较担心，无所谓和非常担心的占比最小。如果将农民选择一点也不担心、不很担心和无所谓视为农民养老风险小，占比 73.3%；将农民选择比较担心和非常担心视作农民养老风险大，占比 26.7%。说明新疆地区农民养老风险感知程度不高，或者说养老风险问题不是特别严重。

从年龄分组和性别分组来看，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农民养老风险不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和性别差异，也即各年龄段农民、男性与女性农民的养老风险程度分布情况大致相同。

表 3-1 农民养老风险程度及其分布（人，%）

养老 风险	年龄分组						性别				合计	
	中年		低龄老人		中高龄老人		男性		女性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一点也不担心	38	26.8	82	21.1	52	26.8	90	21.8	82	26.3	172	23.8
不很担心	50	35.2	168	43.3	64	33.0	172	41.7	110	35.3	282	39.0
无所谓	14	9.9	40	10.3	22	11.3	42	10.2	34	10.9	76	10.5
比较担心	30	21.1	78	20.7	44	22.7	86	20.9	66	21.2	152	21.0
非常担心	10	7.0	20	6.2	12	6.2	22	5.3	20	6.4	42	5.8
合计	142	100	388	100	194	100	412	100	312	100	724	100

注：中年为年龄 45~59 岁之间，低龄老人为年龄在 60~69 岁之间，中高龄老人 70 岁及以上。

二、养老风险形式

农民养老风险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分别是养老风险程度和养老风险形式。从农民养老风险程度与风险形式的交互分析看（见表 3-2），农民养老风险程度与风险形式显著相关。就农民风险形式而言，担心缺乏经济来源的人数占比 23.3%，生活无人照料为 30.1%，精神孤独空虚为 23.6%，生病得不到治疗为 12.6%，无人送老

上山为 3.1%，其他为 7.3%。可见，按照养老风险的普遍性由大到小，农民面临的养老风险依次是生活照料风险、精神慰藉风险、经济保障风险、医疗保健风险和临终关怀风险。经济保障风险不再是农民面临的最普遍的养老风险形式。生活照料风险的普遍性最大，精神慰藉风险已成为农民养老风险中不容忽视的部分，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以及关注农村老年人精神健康是老龄时代的真切召唤。就农民养老风险程度与形式的关系而言，在养老风险程度最高的老年人群中，比例由大至小依次是经济保障风险、生活照料风险、临终关怀风险、医疗保健风险和精神慰藉风险。在养老风险程度最低的老年人群中，比例由大至小依次是精神慰藉风险、生活照料风险、经济保障风险、医疗保健风险和临终关怀风险。

表 3-2 农民养老风险程度与风险形式的交互分析（人，%）

形式		您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吗					合计
		一点不担心	不太担心	无所谓	比较担心	非常担心	
您最担心的养老问题是	缺乏经济来源	20	48	34	44	20	166
		12.2	17.1	44.7	28.9	50.0	23.3
	生活无人照料	36	88	26	52	12	214
		22.0	31.4	34.2	34.2	30.0	30.1
	精神孤独空虚	66	74	10	16	2	188
		40.2	26.4	13.2	10.5	5.0	23.6
	生病得不到治疗	16	38	2	32	2	90
		9.8	13.6	2.6	21.1	5.0	12.6
	无人送老上山	0	12	0	6	4	22
		0.0	4.3	0.0	3.9	10.0	3.1
	其他	26	20	4	2	0	52
		15.9	7.1	5.3	1.3	0.0	7.3
合计		164	280	76	152	40	712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Pearson Chi-square=148.326 Asymp.Sig.=0.000

第二节 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影响的回归分析

一、Ordinal Logistic 回归模型

农民养老风险程度大小为本文因变量之一，共分为以下 5 个水平：非常担心、比较担心、无所谓、不太担心和一点不担心，分别取值 1、2、3、4、5。由于被解释变量具有有序多分类特征，故选取 Ordinal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 p 个自变量拟合 4 个模型如下：

由于 SPSS 的 Logistic 过程尚无多重共线性诊断的结果输出，可用线性回归模

型拟合检验（张文彤，2013）。结果显示，最小容忍度为 0.418（不小于 0.1），方差膨胀因子最大为 2.390（不大于 5），结合特征值及条件指数，认为共线性问题不严重。

$$\begin{aligned}\log it \frac{\pi_1}{1-\pi_1} &= -\alpha_1 + \beta_1 x_1 + \dots + \beta_p x_p \\ \log it \frac{\pi_1 + \pi_2}{1-(\pi_1 + \pi_2)} &= -\alpha_2 + \beta_1 x_1 + \dots + \beta_p x_p \\ \log it \frac{\pi_1 + \pi_2 + \pi_3}{1-(\pi_1 + \pi_2 + \pi_3)} &= -\alpha_3 + \beta_1 x_1 + \dots + \beta_p x_p \\ \log it \frac{\pi_1 + \pi_2 + \pi_3 + \pi_4}{1-(\pi_1 + \pi_2 + \pi_3 + \pi_4)} &= -\alpha_4 + \beta_1 x_1 + \dots + \beta_p x_p\end{aligned}$$

二、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影响的估计结果及解释

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的 Ordinal Logistic 回归结果如表 3-3。检验表明，模型总体的显著性水平为 0.000，具有统计学意义。伪 R 方 nagelkerke 为 0.162，表示该模型中自变量对农民养老策略的解释比例为 16.2%，拟合程度较好。

（一）人力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的影响

在人力资本变量中，除儿子数量外，女儿数量、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对农民养老风险的影响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具体而言，儿子数量对农民养老风险具有正向影响，儿子数量每增加一个，农民养老风险较大的概率发生比提高 20.1%。儿子数量越多，农民养老风险越大，验证了“多子未必多福”的现象。儿子间关于承担养老责任大小的博弈，反而加剧了农民的养老风险。女儿数量对农民养老风险具有负向影响，女儿数量越多，农民养老风险越小，但这一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与农民养老风险之间的相关关系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不同文化程度、健康状况不同的农民，其养老风险不存在显著差异。可能的差异是，新疆农村地区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健康状况普遍为一般作用，文化程度的差异和健康状况的差异不明显。

（二）自然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的影响

在自然资本变量中，拥有耕地数量与农民养老风险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种植土地数量与农民养老风险相关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具体而言，拥有土地数量对农民养老风险具有负向影响，耕地数量越多，农民养老风险越小。但土地分散农民养老风险的功能在弱化，耕地数量每增加 1 个单位，农民养老风险大的概率仅下降了 1%。可能的原因是，新疆农村地区土地社会化和市场化的程度不高，土地的其他附加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种植土地数量对农民养老风险具有正向影响，即农民种

植土地数量越多, 养老风险越大。可能的原因是, 土地种植数量多, 说明农民对土地种植收入的依赖程度高, 而土地收入易受到季节性及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而波动, 故而农民的养老风险感知较大。但是这种关系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三) 物质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的影响

在物质资本变量中, 房屋面积、交通类固定资产和生产类固定资产对农民养老风险均存在显著影响。具体而言, 房屋面积对农民养老风险具有负向作用, 即房屋面积越大, 农民养老风险程度越低, 房屋面积每增加一个单位, 农民倾向于养老风险较大的概率发生比降低了 0.5%。交通类固定资产对农民养老风险亦存在负向影响, 与没有交通类固定资产的农户相比, 拥有交通类固定资产的农民倾向于养老风险较大的概率发生比降低了 48.1%。说明在新疆地区, 房屋建设、生活类固定资产的投资对化解农民养老风险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与房屋相比, 小轿车化解风险的功能远远大于房屋的作用。生产类固定资产对农民养老风险存在正向影响, 拥有农业生产类固定资产的农民, 其倾向于养老风险较大的概率发生比是没有生产类固定资产农民的 1.514 倍。说明生产类固定资产在新疆农民保障中不具有生计资本的基本功能, 对化解农民养老风险没有意义。

(四) 金融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的影响

在金融资本变量中, 自评经济状况和家庭储蓄额对农民养老风险均存在显著影响。具体而言, 自评经济状况对农民养老风险存在负向影响。自评经济状况越好, 农民养老风险越小, 自评经济状况每提高一个单位, 农民养老风险感知较大的概率发生比降低了 58.9%。家庭储蓄额对农民养老风险也存在负向作用, 家庭储蓄额等级越高, 农民养老风险越小, 家庭储蓄额每提高一个等级, 农民倾向于养老风险较大的概率发生比降低了 16.4%。与自评经济状况相比, 家庭储蓄额对农民养老风险的影响更大。说明农民对自身及家庭经济状况的认知更趋理性、客观。

(五) 社会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的影响

在社会资本变量中, 除村经济发展情况外, 交通便利性、是否村干部以及邻里关系对农民养老风险均存在显著影响。具体而言, 村经济发展情况对农民养老风险具有负向影响, 即村经济发展状况越好, 农民养老风险感知程度越小。但是这一关系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可能的原因是农民对村经济发展对农民养老保障促进作用的预期不高。交通便利性、是否村干部和邻里关系对农民养老风险存在负向影响, 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 对农民养老风险影响最大的因素为是否村干部, 交通便利性次之, 邻里关系最小。具体的数据显示是, 村干部对农民养老风险感知程度较大的概率发生比是非村干部的 37.9%; 交通便利性每提高一个单位, 农民养老风险较大的概率发生比降低了 21.6%; 邻里关系每提高一个单位, 农民养老风险较大的概率发生比降低了 16.1%。说明了以下几点: 一是, 政治资本已成为农民应对养

老风险的重要力量；二是，交通状况的改善有利于降低农民的养老风险感知程度大小；三是，虽然互助养老在农村社区存在一定的基础，但是发展薄弱，有待进一步挖掘和开发。

表 3-3 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策略的 Ordinal Logistic 回归

变量	B	SE	Sig.	OR
人力资本变量				
儿子数量	0.183	0.070	0.008	1.201
女儿数量	-0.053	0.620	0.396	0.948
文化程度	-0.029	0.092	0.754	0.971
健康状况	0.065	0.105	0.539	1.067
自然资本变量				
拥有耕地数量	-0.010	0.005	0.065	0.990
种植耕地数量	0.000	0.000	0.652	1.000
物质资本变量				
房屋面积	-0.005	0.001	0.000	0.995
交通类固定资产	-0.655	0.212	0.002	0.519
农业机器类固定资产	0.415	0.181	0.022	1.514
金融资本变量				
自评经济状况	-0.889	0.137	0.000	0.411
家庭储蓄额	-0.179	0.081	0.028	0.836
社会资本变量				
村经济发展状况	-0.105	0.130	0.418	0.900
交通便利性	-0.231	0.102	0.024	0.794
是否村干部	-0.969	0.262	0.000	0.379
邻里关系	-0.175	0.102	0.087	0.839
模型拟合效果				
模型显著性水平			0.000	
-2 Log Likelihood			1714.453	
Cox and Snell R2			0.153	

第四章 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策略的影响

第一节 农民养老策略现状与特征

一、农民养老策略现状

（一）供养方式

根据供养方式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 4-1），农民选择依靠子女、依靠自己、依靠社保和老了再说的比例分别为 16.0%、42.4%、25.6%和 16.0%。在该地区，农民选择依靠自己的倾向最大，依靠社保次之，依靠子女和老了再说最小，说明新疆地区家庭养老的地位有所下降，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模式得到了较大发展。老了再说的养老策略占有一定比例的原因可能有，一是部分中年农民比较年轻，未对未来养老问题进行思考与规划；二是部分农民生计资本匮乏，无法安顿好老年生活。至于哪一个方面的原因更重要，有待进一步验证。

从年龄分组的情况来看，各年龄类别农民的供养方式存在普遍差异性（卡方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 0.000），同时，在中年农民与低龄老年农民的供养方式中，均是依靠自己占据第一位，体现了不同年龄层次农民养老策略的延续性。不难发现，随着年龄段的变化，农民依靠子女和依靠社保的倾向呈现完全相反的变化趋势，即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民依靠社保的倾向加强，而依靠子女的倾向减弱。前者说明，虽然从目前来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保障中高龄老年农民基本生活起到了较大作用，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新农保不足以继续保障老年生活。后者则反映了“养儿防老”策略在新疆地区表现出在年龄上持续强化的趋势，这与 2009 年全国 10 省千户农民调查数据的结果完全相反（于长永，2012），有待进一步讨论。从性别来看，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农民养老策略与性别的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农民的养老策略并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表 4-1 农民供养方式及其年龄和性别分布（人，%）

供养 方式	年龄分组						性别				合计	
	中年		低龄老人		中高龄老人		男性		女性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依靠子女	40	22.5	72	15.9	24	11.0	80	16.5	56	15.4	136	16.0
依靠自己	74	41.6	210	46.3	76	34.9	216	44.4	144	39.6	360	42.4
依靠社保	30	16.9	98	21.6	90	41.3	116	23.9	102	28.0	218	25.6
老了再说	34	19.0	74	16.3	28	12.8	74	15.2	62	17.0	136	16.0

注：中年为年龄 45~59 岁之间，低龄老人为年龄在 60~69 岁之间，中高龄老人为 70 岁及以上。

根据表 4-1，新疆地区依靠子女养老策略随着年龄的减小表现出持续强化趋势，为增强数据结论的可靠性，采用“变量替代”方法进行进一步验证。“养儿防老”¹⁰策略与子女养老策略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替代性，在问卷设计中为“您同意养儿可以防老吗”，将该变量与年龄分组变量进行交叉分析，结果见表 4-2。农民“养儿防老”策略的强化趋势比较明显，即年龄越小的农民，“养儿防老”观念反而越强。从中高龄老人到低龄老人再到中年农民，农民同意“养儿防老”策略的比例分别是 73.3%、76.3%、83.6%，比例不断增大。

表 4-2 不同年龄类别的农民对“养儿防老”策略的态度（人，%）

		年龄分组			合计
		中年农民	低龄老人	中高龄老人	
您同意养儿可以防老吗？	同意	112	296	154	562
		83.6	76.3	73.3	100
	不同意	22	92	56	170
		16.4	23.7	26.7	100
合计		134	388	210	732
		100	100	100	100

注：中年为年龄 45~59 岁之间，低龄老人为年龄在 60~69 岁之间，中高龄老人为 70 岁及以上。

（二）居住安排

农民养老策略具有二维特征，即以供养方式的分类和以居住安排为依据的分类。从农民养老供养方式与居住安排的交互分析来看（见表 4-3），供养方式与居住安排策略存在显著相关性。从居住安排看，一个人独住、老两口住、和子女一起住的比例依次是 10.2%、30.5%和 59%。与子女一起住的比例最高，老两口住次之，独居最少。以此可知，仅仅考虑与配偶一起居住和老年人独居的状况，空巢老人的比例已经高达 40.7%。说明我国空巢化的形势已经比较严峻了。从经济来源看，选择依靠储蓄来渡过老年生活策略的比例最高，选择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人数最少，比例最低。如果将“保持劳动能力”、“多存点钱或财产”、“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视为农民自我养老，将“多在子女教育上投资”视为家庭养老，将“参加农村养老保险”视为社会养老，易知，农民选择自我养老的比重最高、社会养老次之、家庭养老最低。

¹⁰ “养儿防老”中的“儿”表示的是儿女，而非“儿子”。

表 4-3 供养方式与居住安排的交互分析（人，%）

保障老年生活最重要的办法								
项目	保持劳 动能力	多存点 钱或 财产	多在子女 教育上 投资	购买商业 养老保险	参加农村 养老保险	没办法， 等老了再 说	合 计	
您 和 谁 住 在 一 起	一个人独住	6	18	16	0	22	0	62
		8.3	7.6	15.1	0.0	12.8	0.0	10.2
	老两口住	22	90	28	2	34	8	184
		30.6	37.8	26.4	100.0	19.8	0.4	30.5
	和子女一 起住	42	128	62	0	116	12	380
		58.3	53.8	58.5	0.0	67.4	0.6	59.0
	其他	2	2	0	0	0	0	4
		2.8	0.8	0.0	0.0	0.0	0.0	0.3
	合计	72	238	106	2	172	20	61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Pearson Chi-square=50.132 Asymp.Sig.=0.000								

二、农民养老策略多样性

不同于单一的养老模式，农民养老策略具有多样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手段的多样性，二是不同手段组合的多样性。从总体养老策略来看（见表 4-4、表 4-5、表 4-6），农民解决经济赡养问题、解决生活照料问题、解决精神赡养问题的养老策略分别有 5 种，策略组合高达 125 种以上。从具体养老策略来看，农民解决每个养老问题的策略都具有多样化特点。

（一）经济赡养方面

从经济赡养方面看，除“靠老伴”外，选择“靠儿女赡养”、“靠自己”、“靠养老保险”和“靠政府救助”的比例均超过一半，说明农民经济赡养策略具有多样化特征、兼具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模式。具体而言，从人数占比来看，由大到小依次是“靠儿女赡养”、“靠自己”、“靠政府救助”、“靠养老保险”和“靠老伴”，比例分别为 88.0%、82.2%、73.2%、52.4%、37.2%%。“靠儿女赡养”的比例最大，说明在经济赡养中，依靠子女依然是老年人最普遍的养老策略选择。“靠自己”次之，说明老年人也具有一定的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依靠政府救助”的比例高达 73.2%，充分体现了政府在农民养老中的兜底功能。“靠养老保险”的比例约为一半，要么是新疆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不高，要么是新疆地区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养老期望不高。“靠老伴”的比例最低，比较符合现实。一般的说，夫妻本是命运共同体，在经济生活方面本来不分彼此。

表 4-4 经济赡养策略的类型及其分布（人，%）

问题：您解决经济赡养来源问题的途径？							
策略类型		频数	频率	策略类型		频数	频率
靠儿女赡养	是	604	88.0	靠老伴	是	214	37.2
	否	82	12.0		否	362	62.8
靠自己（劳动、储蓄、财产）	是	544	82.2	靠政府救助	是	426	73.2
	否	118	17.8		否	156	26.8
靠养老保险	是	368	52.4	其他	是	20	3.4
	否	334	47.6		否	574	96.6

（二）生活照料方面

从生活照料方面看，人数占比从大到小依次是，“靠儿女照顾”、“靠自己”、“靠老伴”、“进养老院”和“雇人照顾”，比例分别为 90.0%、84.3%、68.7%、18.1%和 10.8%。“靠儿女照顾”的比例最大，说明在生活照料方面，依靠子女依然是老年人最普遍的养老策略选择。“靠自己”的比例次之，说明生活自理是老年人解决日常生活照料的重要来源。与经济赡养中“靠老伴”比例小的现象不同，生活照料方面对老伴的依赖性较高。“进养老院”和“雇人照顾”的占比最小，说明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水平较低。

表 4-5 生活照料策略的类型及其分布（人，%）

问题：您解决生活照料问题的途径？							
策略类型		频数	频率	策略类型		频数	频率
靠儿女照顾	是	648	90.0	靠老伴	是	448	68.7
	否	72	10.0		否	204	31.3
雇人照顾	是	62	10.8	靠自己	是	580	84.3
	否	512	88.9		否	108	15.7
进养老院	是	104	18.1	其他	是	12	2.1
	否	470	81.9		否	568	97.9

（三）精神赡养方面

从精神赡养方面看，按照策略普及型由高至低依次是：“靠子女”、“靠邻居、朋友”、“靠自己解决”、“靠老伴陪伴”和“靠政府娱乐设施”，比例分别是 86.4%、73.2%、71.8%、70.5%和 16.8%。“靠子女”的比例最高，说明在精神赡养方面，依靠子女依然是最普遍的策略选择，儿女依然是老年人最重要的精神牵挂。“靠邻居、朋友”的比例高达 73.2%，说明农村地区友好的邻里关系有助于解决农民的精神慰藉问题。“靠自己解决”的比例高达 71.8%，说明培养老年生活兴趣是解决农民精神慰藉问题的重要路径。“靠政府娱乐设施”的比重最小，说明政府在农民精

神养老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

表 4-6 精神赡养策略的类型及其分布（人，%）

问题：您解决心理、精神上的孤独无聊的途径？							
策略类型		频数	频率	策略类型		频数	频率
靠自己解决	是	494	71.8	靠邻居、朋友	是	498	73.2
	否	194	28.2		否	182	26.8
靠老伴陪伴	是	454	70.5	靠政府娱乐设施	是	104	16.8
	否	190	29.5		否	516	60.4
靠子女	是	582	86.4	其他	是	18	3.1
	否	92	13.6		否	572	96.9

第二节 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策略影响的回归分析

一、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

在农民养老策略的两种划分依据中，居住安排仅仅反映的是地点的差异，而供养方式反映了养老资源获取途径的差异，更具有实质性意义。因此，选取供养方式为因变量，共 4 水平，分为：依靠自己、依靠社保、老了再说和依靠子女，分别取值 1、2、3、4。由于被解释变量具有无序多分类特征，故选取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 p 个自变量拟合 3 个广义 Logit 模型：

$$\begin{aligned}\text{logit}(\pi_1/\pi_4) &= \alpha_1 + \beta_{11}x_1 + \dots + \beta_{1p}x_p \\ \text{logit}(\pi_2/\pi_4) &= \alpha_2 + \beta_{21}x_1 + \dots + \beta_{2p}x_p \\ \text{logit}(\pi_3/\pi_4) &= \alpha_3 + \beta_{31}x_1 + \dots + \beta_{3p}x_p\end{aligned}$$

同上，拟用线性回归模型拟合检验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显示，最小容忍度为 0.444（不小于 0.1），方差膨胀因子最大为 2.252（不大于 5），结合特征值及条件指数，认为共线性对于本文不严重。

二、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策略影响的估计结果及解释

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策略的多项 Logistic 回归结果如表 4-7。检验表明，模型总体的显著性水平为 0.000，具有统计学意义。伪 R 方 nagelkerke 为 0.380，表示该模型中自变量对农民养老策略的解释比例为 38.0%，拟合程度较好。模型 1、模型 2、模型 3 以依靠子女为参照类，用来估计农民选择依靠自己、依靠社保、还是老了再说的倾向。

（一）人力资本变量对农民养老策略的影响

女儿数量、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对农民的养老策略有显著影响，儿子数量与农民养老策略的关系在统计学上无显著意义。具体而言，与依靠自己和老了再说相比，女儿数量越多的农民越倾向于依靠子女，而儿子数量与农民养老策略无显著相关性。可能的解释有以下几种：一是随着农村男性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父母对儿子的依赖程度降低，儿子在保障老年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减弱；二是随着女性劳动力的解放，走向劳动岗位的妇女也具备承担父母养老义务的能力；三是儿子间对养老责任大小的相互博弈，最终可能造成儿子赡养功能的缺失，而女儿在生活照料以及情感慰藉方面的作用不易受到数量多少的影响。文化程度越高，农民选择依靠自己和依靠社保的倾向就越大。文化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民选择依靠社保和依靠自己的概率发生比分别是农民选择依靠子女这一比值的 1.350 倍、1.680 倍。与其他三种养老策略相比，健康状况越好，农民越倾向于选择依靠子女策略。健康状况改善一个单位，农民选择依靠自己、老了再说、依靠社保的概率发生比分别是选择依靠子女概率发生比的 0.632 倍、0.475 倍和 0.319 倍。

（二）自然资本变量对农民养老策略的影响

农民拥有的耕地数量和种植的耕地数量对选择依靠子女还是依靠自己，选择依靠子女还是依靠社保均无显著影响。耕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自然资本，是农民生活的重要倚仗，出现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新疆地广人稀，农民的人均耕地占有量较大（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约为 1.52 亩，而在样本中该均值为 17.124 亩），在土地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后，其附加价值相对较低，从而对农民在个养老策略之间选择的影响不大。但农民拥有的耕地数量和种植的耕地数量对农民选择依靠子女还是老了再说的影响通过了 5% 和 1%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而言，拥有耕地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民选择老了再说的概率发生比是选择依靠子女策略的 1.403 倍，而种植耕地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民选择老了再说的概率发生比是选择依靠子女的 0.935 倍。前者的解释可能是，虽然新疆地区土地的附加价值相对较低，但仍然是农民无计可施情况下的最后依靠；农民在内心上更倾向于“养儿防老”，但毕竟依靠自己（土地保障）才是最“踏实”的，这样摇摆的想法造成了农民选择了老了再说。后者的解释可能是，耕地无疑束缚了农民的“自由”以及追求其他物质财富的可能，待农民年老身体机能弱化而无法耕种之时，依靠子女是他们常见的策略。

（三）物质资本变量对农民养老策略的影响

房屋面积、是否有交通类固定资产、是否有农业机器类固定资产都对农民的养老策略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房屋面积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民选择依靠自己的概率发生比比选择依靠子女的概率发生比增长了 0.005 倍。与依靠子女相比，在拥

有交通类固定资产的情况下，农民更倾向于选择依靠自己、依靠社保和老了再说，其概率发生比分别增加了 3.426 倍、1.579 倍和 24.247 倍。相反，与其他养老策略相比，在拥有农业机器类固定资产时，农民更倾向于选择依靠子女策略，农民选择依靠自己、依靠社保和老了再说的概率发生比分别是选择依靠子女概率发生比的 0.287 倍、0.420 倍和 0.163 倍。可能的解释是，汽车等交通类固定资产更具有财产的保障特性，其在方便出行之外，通常被视为是仅次于房屋的重要性财产。如此，农民才更有可能选择比子女养老更具独立性的其他养老策略；而拖拉机等农业机器类固定资产更多的是用于农业生产，反映了农民农业生产的属性，与前文种植耕地数量类似。

（四）金融资本变量对农民养老策略的影响

自评经济状况与农民选择依靠子女还是依靠自己、选择依靠子女还是依靠社保无显著相关性。与依靠子女相比，自评经济状况越好，农民养老策略越倾向于选择老了再说。自评经济状况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民选择老了再说的概率发生比比选择家庭养老概率发生比增加了 0.884 倍。可能的解释是，在经济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农民往往对未来养老问题较少担忧，对养老缺少规划。与依靠子女相比，家庭储蓄额越大，农民选择依靠自己和依靠社保的可能性越大，选择老了再说了可能性越小。具体而言，农民选择依靠自己、依靠社保、老了再说的概率发生比分别是选择依靠子女的概率比的 1.706、1.406 倍和 0.631 倍。说明家庭储蓄越多，农民养老策略选择的优先次序依次是依靠自己、依靠社保、依靠子女和老了再说。

（五）社会资本变量对农民养老策略的影响

村经济发展状况、交通便利性和是否村干部对农民养老策略有显著影响，邻里关系与农民养老策略的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无统计学意义。具体而言，村经济发展状况越好，农民养老策略的倾向依次是依靠社保、依靠自己、依靠子女和老了再说。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依靠社保的倾向越强。交通便利性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民选择依靠自己的概率发生比比农民选择依靠子女的概率发生比增加了 0.320 倍。可能的解释是，交通的便利性为农民积累自我养老资本创造了更多机会。而交通便利性与农民其他养老策略之间的选择无显著相关性。是村干部的农民与不是村干部的农民相比，农民选择依靠自己和依靠社保的概率发生比分别是农民选择依靠子女概率发生比的 3.219 倍和 7.634 倍，说明村干部在自我养老能力上和对社会养老方式的接受程度上都要比一般群众好。

表 4-7 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策略的多项 Logistic 回归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依靠自己		依靠社保		老了再说	
	B	Exp(B)	B	Exp(B)	B	Exp(B)

人力资本变量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依靠自己		依靠社保		老了再说	
	B	Exp(B)	B	Exp(B)	B	Exp(B)
儿子数量	0.024	1.025	0.144	1.155	-0.136	0.873
女儿数量	-0.208	0.812**	0.042	1.043	-0.371	0.690**
文化程度	0.459	1.680***	0.300	1.350**	0.150	1.161
健康状况	-0.459	0.632**	-1.144	0.319***	-0.744	0.475***
自然资本变量						
拥有耕地数量	0.013	1.013	-0.019	0.981	0.042	1.043**
种植耕地数量	-0.004	0.996	-0.009	0.991	-0.068	0.935***
物质资本变量						
房屋面积	0.005	1.005**	0.001	1.001	0.003	1.003
交通类固定资产	1.488	4.426**	0.947	2.579**	3.229	25.247***
农业机器类固定资产	-1.247	0.287***	-0.868	0.420**	-1.814	0.163***
金融资本变量						
自评经济状况	0.045	1.046	0.082	1.086	0.633	1.884**
家庭储蓄额	0.543	1.706***	0.341	1.406**	-0.460	0.631**
社会资本变量						
村经济发展状况	0.626	1.870**	0.835	2.304***	-1.205	0.300***
交通便利性	0.264	1.302*	0.069	1.071	-0.117	0.890
是否村干部	1.440	4.219*	2.156	8.634**	-0.486	0.615
邻里关系	0.201	1.223	-0.256	0.774	-0.134	0.874
截距项	-4.369		-5.396		-4.328	
-2 倍对数似然值	1836.289		卡方值		368.910	
显著性水平	0.000		Cox 和 snell		0.352	
Nagelkerke	0.380		样本量		850	

注:***、**、* 分别表示变量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

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 2012 年新疆地区农村调查的截面数据，对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并就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和策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如下：

（一）农民养老风险程度低，生活照料、精神慰藉风险凸显

农民养老风险形式与风险程度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从风险程度看，农民养老风险程度包括“一点不担心”、“不很担心”、“无所谓”、“比较担心”和“非常担心”五个水平。其中，担心养老问题的农民的比例为 26.7%，农民养老风险不算严峻。农民养老风险不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和性别差异。从风险形式看，农民养老风险形式包括经济保障风险、生活照料风险、精神慰藉风险、医疗保健风险和临终关怀风险；比例分别是：生活无人照料的人数占比为 30.1%，精神孤独空虚为 23.6%，缺乏经济来源为 23.3%，生病得不到治疗为 12.6%，无人送老上山为 3.1%，其他为 7.3%。生活照料风险和精神慰藉风险已经取代经济保障风险，成为农民养老最大的风险形式，但经济保障风险仍然是农民养老的重要风险形式之一；医疗保健风险和临终关怀风险分别占据一定比例。

（二）农民养老策略多样化，“依靠自己”是农民养老的主要策略

农民养老策略多样化特征显著，解决经济赡养问题、生活照料问题、精神赡养问题的养老策略分别有 5 种，策略组合高达 125 种以上。就经济赡养策略而言，从人数占比来看，由大到小依次是“靠儿女赡养”、“靠自己”、“靠政府救助”、“靠养老保险”和“靠老伴”，比例分别为 88.0%、82.2%、73.2%、52.4%、37.2%。就生活照料策略而言，人数占比从大到小依次是“靠儿女照顾”、“靠自己”、“靠老伴”、“进养老院”和“雇人照顾”，比例分别为 90.0%、84.3%、68.7%、18.1%和 10.8%。就精神赡养策略而言，按照策略普及性由高至低依次是“靠子女”、“靠邻居、朋友”、“靠自己解决”、“靠老伴陪伴”和“靠政府娱乐设施”，比例分别是 86.4%、73.2%、71.8%、70.5%和 16.8%。综上，依靠子女和靠自己是农民最普遍的养老策略选择。

农民养老供养方式与居住安排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从供养方式看，农民养老策略包括依靠自己、依靠社保、依靠子女和老了再说四个方面，其比例分别为 42.4%、25.6%、16.0%和 16.0%。依靠自己已经取代依靠子女成为农民养老策略的首选，这

也是农民在“少子老龄化”形势下，摆脱对子女过度依赖的客观和理性选择；依靠子女虽然已不是主流选择，但仍然是农民养老的重要策略之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具有一定水平，已成为农民养老策略的重要选择。农民养老策略的性别差异不显著，但年龄差异明显。从年龄分组情况来看，从中高龄老人、低龄老人再到中年农民，选择依靠子女策略的比例分别是 11.0%、15.9%和 22.5%。随着年龄降低，选择依靠子女策略的比例在增加，说明农民对子女养老抱有较大期望。从居住安排看，一个人独住、老两口住、和子女一起住的比例依次是 10.2%、30.5%和 59%。与子女一起住的比例最高，老两口住次之，独居最少。老两口住和一个人独居的比例之和为 40.7%，农村老人空巢化现象普遍。

（三）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存在显著影响

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存在多重影响。从整体看，人力资本因素、自然资本因素、物质资本因素、金融资本因素和社会资本因素均对农民养老风险存在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在人力资本因素中，儿子数量对农民养老风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儿子数量越多，农民养老风险越大，验证了“多子未必多福”的现象；女儿数量、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对农民养老风险的影响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在自然资本因素中，拥有耕地数量对农民养老风险具有负向影响，耕地数量越多，农民养老风险越小；种植土地数量与农民养老风险相关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物质资本因素中，房屋面积对农民养老风险具有负向作用，即房屋面积越大，农民养老风险程度越低；交通类固定资产对农民养老风险亦存在负向影响，与没有交通类固定资产的农户相比，有交通类固定资产的农户的养老风险程度较低；生产类固定资产对农民养老风险存在正向影响，与没有生产类固定资产的农户相比，有生产类固定资产的农户的养老风险程度较高。在金融资本变量中，自评经济状况和家庭储蓄额对农民养老风险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自评经济状况越好、家庭储蓄额等级越高，农民养老风险越低。在社会资本变量中，交通便利性、是否村干部和邻里关系对农民养老风险存在负向影响，对农民养老风险影响最大的因素为是否村干部，交通便利性次之，邻里关系最小；村经济状况对农民养老风险的负向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策略亦具有多重影响。从整体看，人力资本因素、自然资本因素、物质资本因素、金融资本因素和社会资本因素均对农民养老策略均存在显著影响。具体地说，除了儿子数量和邻里关系外，生计资本的其他变量对农民养老策略有显著影响。就农民选择依靠自己而非依靠子女策略而言，文化程度、房屋面积、交通类固定资产、家庭储蓄额、村经济发展情况、交通便利性和是否村干部对农民养老策略独立化有正向影响；女儿数量、健康状况以及农业机器类固定资产对其有负向影响。而就农民选择依靠保险而不是依靠子女策略而言，文化程度、交通类固定资产、家庭储蓄额、村经济发展情况和是否村干部对其有正向影响；健康状

况和农业机器类固定资产对其有负向影响。除房屋面积、交通便利性、女儿数量以外,影响农民自我养老与社会养老的生计资本因素一致,且影响方向相同。

二、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通过构建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探究农民养老风险的现状与特征及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的作用方式。研究发现,在内外风险扰动下,农民养老仍然面临多种风险形式和多种策略选择。结合本文结论及前人研究成果,对于实现农村养老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 坚持以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养老战略

2017年《“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健全”的发展目标。对于推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农村养老问题,还需要了解农村养老风险的基本形势,对症下药。对农民养老风险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农村老年群体面临多重养老风险,生活照料风险、精神慰藉风险和经济保障风险尤为显著,占据农民养老风险的前三位。其中生活照料风险和精神慰藉风险已成为农村老年人最显著的养老风险,而经济保障风险的显著性有所降低,但仍然不可忽略。

具体而言,应对农村老年群体的生活照料风险,要进一步发展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居家与社区相结合,既满足了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的生活照料需求,又发挥了家庭在养老问题中的基础力量,符合社区养老的依托地位。应对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风险,一要,推动积极老龄化发展,通过举办文化娱乐活动,完善老年人活动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二要,促进全社会尤其是子女尊老敬老,积极宣传《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提高全社会敬老爱老意识。应对农村老年人生活照料风险,首先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其次是要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高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障能力。

(二) 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供给主体多元模式

农民的养老策略是多维的。农民养老问题不是农民的个人问题,也不单是农户的家庭问题,而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性、系统性问题。解决农村养老难题,需要集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力量,构建一个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与此同时,农民养老策略实现从“依赖养老”到“独立养老”的转变,也为农村老年人养老责任分担机制的重构创造了契机。

具体而言,一要促进家庭养老健康发展。家庭在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作用不可忽略,积极发挥子女的养老功能,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减轻社会养老负担

和促进国家和谐稳定。因此需要大力弘扬孝道文化，鼓励子女积极承担养老责任；通过立法等措施，监督子女积极履行养老义务。二要鼓励发展独立养老模式。通过教育等方式提高农民的忧患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鼓励农民通过储蓄、投资等方式增加收入，在风暴来临之前，为未来养老提前做好准备。三要完善社会养老机制。完善新农保机制建设，合理控制新农保缴费水平，降低农民缴费压力；提高新农保的保障水平，提高养老保险的保障能力。完善新农合机制建设，加快新农合与城居保以及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统筹规划，提升新农合的医疗保障水平。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包括加大财政投入保障经费充足、建立激励机制及绩效考评和监管机制等措施。四要创新农村养老模式，推动互助养老、以房养老以及医养结合等新兴养老模式试点和推广。

（三）促进农户生计资本数量增加与结构优化

基于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可知，生计资本是农民养老能力评估的基础，农民养老风险感知与养老策略选择是基于养老能力的合理预期与估计。本文数据结果表明，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化解农民养老风险、促进农民养老策略的可持续，不能仅靠增加农户生计资本的数量，还要注重生计资本结构的优化。

具体而言，在人力资本方面，儿子数量越多，农民养老风险越大，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越发明显。因此，计划生育政策要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平衡男女性别比以及提高人口素质。文化程度越高，农民自我养老能力越强。因此，要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力度，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在自然资本方面，耕地数量对降低农民养老风险、增强农民自我养老保障能力均有显著影响。因此，要积极保障农民土地的合法权益，将土地资本转化为农民养老的重要保障。在物质资本方面，房屋面积和交通类固定资产对增强农民自我保障能力、弱化农民养老风险具有积极作用。因此，要为农户创造更多积累财富的机会，增加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在金融资本方面，经济状况越好与家庭储蓄越高，农民养老风险程度越小，农民自我保障水平越高。因此，要拓宽农民收入渠道，促进农户增收创收。在社会资本方面，社会资本状况越好，农民养老能力越大。因此，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大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水平。

参考文献

- [1] 阿玛蒂亚·森：《饥饿与公共行为》，苏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
- [2] 曹立斌. 计生与非计生家庭生计资本状况比较研究——来自湖北省的数据[J]. 人口与经济，2015（02）：119-126.
- [3] 陈艾，李雪萍. 脆弱性——抗逆力：连片特困地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J]. 社会主义研究，2015，（02）：92-99.
- [4] 陈芳，方长春. 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与出路：欠发达地区农村养老模式研究[J]. 人口与发展，2014，01：99-106.
- [5] 戴建兵.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以及老年人口量与质的实证分析——基于“四普”、“五普”和“六普”数据[J]. 兰州学刊，2017，（02）：148-157.
- [6] 邓大松，陈文娟，王增文. 论中国的养老风险及其规避[J]. 经济评论，2008，（02）：87-90.
- [7] 丁士军，张银银，马志雄. 被征地农户生计能力变化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改进[J]. 农业经济问题，2016，37（06）：25-34+110-111.
- [8] 丁志宏. 我国农村中年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研究[J]. 人口研究，2014，04：101-111.
- [9] 范如国. “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复杂性范式与中国参与[J]. 中国社会科学，2017（02）：65-83+206.
- [10] 谷玉良. 农村人口外流与农村养老困境[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01）：114-122.
- [11] 胡宏伟，时媛媛，张薇娜. 需求与制度安排：城市化战略下的居家养老服务保障定位与发展[J]. 人口与发展，2011，06：54-64.
- [12] 黄锐，必勒格. 民族地区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问题及对策研究[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4（02）：44-52.
- [13] 纪红蕾，蔡银莺. 生计资本异质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武汉城市郊区的 516 户农民为例[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7，26（02）：220-226.
- [14] 冀慧珍. 可持续生计理念下的社会救助政策改革[J]. 中国行政管理，2012，（01）：66-70.
- [15] 姜向群. 养老转变论：建立以个人为责任主体的政府帮助的社会化养老方式[J]. 人口研究，2007，（04）：57-62.
- [16] 金梅，申云. 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与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基于准实验的政策评

- 估[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7, 32 (05): 70-81.
- [17]孔祥智, 涂圣伟. 我国现阶段农民养老意愿探讨——基于福建省永安、邵武、光泽三县(市)抽样调查的实证研究[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7, 03: 71-77.
- [18]乐章, 刘二鹏. 家庭禀赋、社会福利与农村老年贫困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37 (08): 63-73+111.
- [19]李春华, 李建新. 居住安排变化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J]. 人口学刊, 2015, 37 (03): 102-112.
- [20]李丹, 许娟, 付静. 民族地区水库移民可持续生计资本及其生计策略关系研究[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5 (01): 51-57.
- [21]李海燕, 蔡银莺. 生计资本对农户参与耕地保护意愿的影响——以成都市永安镇、金桥镇, 崇州市江源镇为例[J]. 冰川冻土, 2015, 37 (02): 545-554.
- [22]李建民. 中国农村计划生育夫妇养老问题及其社会养老保障机制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04, 03: 42-50+82.
- [23]李亮, 宋璐. 家庭资本对农村中青年居民养老策略的影响[J]. 西北人口, 2016, 37 (02): 69-74.
- [24]李俏, 陈健, 蔡永民. “老人农业”的生成逻辑及养老策略[J]. 贵州社会科学, 2016 (12): 158-163.
- [25]李树茁, 梁义成. 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结构视角的可持续生计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10, 7 (02): 1-10+122.
- [26]李树茁, 徐洁, 左冬梅, 曾卫红. 农村老年人的生计、福祉与家庭支持政策——一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J]. 当代经济科学, 2017, 39 (04): 1-10+124.
- [27]李小云, 董强, 饶小龙, 赵丽霞. 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 04: 32-39.
- [28]卢德平. 略论中国的养老模式[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1 (04): 56-63.
- [29]陆杰华, 张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探究——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型视角[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2 (01): 8-14.
- [30]穆光宗, 吴金晶, 常青松. 我国养老风险研究[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28 (06): 103-109+124.
- [31]穆光宗. 低生育时代的养老风险[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2 (01): 1-7.
- [32]穆光宗. 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变革和展望[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0, 05:

- 39-44.
- [33] 聂建亮, 钟涨宝. 家庭保障、社会保障与农民的养老担心——基于对湖北省孔镇的实证调查[J]. 农村经济, 2014 (6): 90-94.
- [34] 蒲新微, 王宇超. 家庭结构变迁下居民的养老预期及养老方式偏好研究[J]. 人口学刊, 2016, (04): 60-66.
- [35] 邵希言, 赵仲杰. 北京城区首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风险及规避对策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 26 (S1): 513-517.
- [36] 沈澈, 邓大松. 养老金投资运营风险的识别与对策[J]. 经济纵横, 2014, (03): 96-100.
- [37] 石智雷. 多子未必多福——生育决策、家庭养老与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J]. 社会学研究, 2015, 05: 189-215+246.
- [38] 宋健. “四二一”结构家庭的养老能力与养老风险——兼论家庭安全与和谐社会构建[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3, 27 (05): 94-102.
- [39] 宋璐, 李树茁. 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家庭生计资本的影响——基于家庭结构的可持续生计分析[J]. 人口研究, 2017, 41 (03): 65-75.
- [40] 苏春红, 李松. 养老金支付风险预测及延迟退休作用评估——以 S 省为例[J]. 财政研究, 2016, (07): 69-79+112.
- [41] 苏芳. 可持续生计: 理论、方法与应用[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24-25.
- [42] 苏永伟, 陈玉萍, 丁士军. 失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新进展[J/OL].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06): 79-85.
- [43] 唐丽霞, 李小云, 左停. 社会排斥、脆弱性和可持续生计: 贫困的三种分析框架及比较[J]. 贵州社会科学, 2010, (12): 4-10.
- [44] 唐利平, 风笑天. 第一代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实证分析——兼论农村养老保险的效用[J]. 人口学刊, 2010, 01: 34-40.
- [45] 陶涛, 丛聪. 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市西城区为例[J]. 人口与经济, 2014, (03): 15-22.
- [46] 王三秀. 国外可持续生计观念的演进、理论逻辑及其启示[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0, (09): 79-84+86.
- [47] 吴春宝. 影响农村养老模式选择的因素分析——以 logistic 回归为分析工具[J]. 调研世界, 2011, 06: 41-43.
- [48] 伍艳. 贫困山区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基于四川省平武县和南江县的调查数据[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37 (03): 88-94+112.

- [49]熊金武,黄义衡.失地农民养老困局与对策浅析[J].农村经济,2015,(03):85-89.
- [50]徐俊.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心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6(3):73-82.
- [51]许汉石,乐章.生计资本、生计风险与农户的生计策略[J].农业经济问题,2012,10:100-105.
- [52]薛庆天.农民养老保障风险分析[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5,18(07):182-184.
- [53]杨云彦,赵锋.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农户生计资本的调查与分析——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09,03:58-65+111.
- [54]于长永.农民养老风险、策略与期望的代际差异[J].农业经济问题,2015,03:24-32+110.
- [55]翟黎明,夏显力,吴爱娣.政府不同介入场景下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基于PSM-DID的计量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7(02):2-15.
- [56]翟振武,陈佳鞠,李龙.2015~2100年中国人口与老龄化变动趋势[J].人口研究,2017,41(04):60-71.
- [57]张冲,朱鹏,童峰.基于主成分分析和逐步回归法的农村老年人养老担心度影响因素研究——以四川为例[J].农业经济,2013,(08):88-90.
- [58]张川川,陈斌开.“社会养老”能否替代“家庭养老”?——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4,11:102-115.
- [59]张会萍,胡小云,惠怀伟.土地流转背景下老年人生计问题研究——基于宁夏银北地区的农户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16(03):56-67.
- [60]张文彤,董健.SPSS统计分析高级教程(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13-117+180.
- [61]赵文娟,杨世龙,王潇.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研究——以云南新平县干热河谷傣族地区为例[J].资源科学,2016,38(01):136-143.
- [62]钟涨宝,李飞,冯华超.养老保障能力评估对农民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5省1573个样本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6,(06):72-81.
- [63]朱晓,范文婷.中国老年人收入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J].北京社会科学,2017(01):90-99.
- [64]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华龄出版社,2015.
- [65]Bodie Z.,Detemple J.,Rindisbacher M. “Life — Cycle Finance and the Design of

- Pension Plans”, Annual 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9, Vol.1, No.1.
- [66] Carmen Diana Deere and Frederick S. Royce. 2009. Rural social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 organizing for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The Americas: U Press of Florida: 136.
- [67] Cherni J A, Hill Y. Energy and policy providing for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in remote locations—The case of Cuba[J]. Geo-forum, 2009, 40: 645-654.
- [68]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R].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IFD, 2000: 68-125.
- [69] Ellis, F. Rural Livelihoods and Diversity in Development Countrie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5-60.
- [70] Farrington et al. 1999.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 practice: early applications of concepts in rural areas. Natural Resource Perspectives,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 [71] G.F. White, Natural Hazards: Local, National, Glob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72] Scoones. 1998.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72.
- [73] Ulrich Beck.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9. P. 74.
- [74] Vista B M, Nel E, Binns T. Land, landlords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The impact of agrarian reform on a coconut hacienda in the Philippines[J]. Land Use Policy, 2012, 29: 154-164.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1]余泽梁：《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基于 CHARLS 数据 7669 个样本的分析》，《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17 年第 1 期；
- [2]余泽梁、于长永：《精准扶贫问题研究述评》，《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 年第 1 期；
- [3]《生计资本对农民养老策略的影响》荣获“第六届全国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优秀研究生学术论坛优秀论文奖”、“2016 年湖北省社会学研究生学术论坛二等奖”；
- [4]主持校研究生创新实践课题：《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的影响因素研究》；
- [5]参与民政部课题：《民政工作社会化研究》。

致 谢

学生时代即将结束，新的征程即将开始，提笔想说的太多太多。

感谢我的导师——于长永老师，成为您的学生我很荣幸，三年中，您在协创中心忙碌的身影、您对我们谆谆的教导历历在目，您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刻苦的钻研精神都时刻激励着我，您不仅在学业上精心指导我，从论文选题、修改、答辩过程中给予了许多中肯意见，在能力上也精心培养我，在生活上您也不忘时刻关心我，使我三年中成长了许多。

感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提供的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科研资源；感谢所有任课老师三年中悉心的传道授业解惑；感谢三年来一起学习、成长的室友、同学们；感谢曾经在协创一起奋斗的小伙伴儿游欣蓓、武依慧，那些紧张忙碌的日子，将成为我们永恒的记忆。

感谢父母这么多年对我的尊重、鼓励和无条件的支持，我会变得更加坚强和独立，去努力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

感谢自己三年中的不懈努力和无悔付出，下一站，我会活得更精彩！